

桓仁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3

目 录

☆→→→☆	桓仁誓师讨倭敌
往事	——回忆辽宁民众自卫军举旗抗日
漫忆	的战斗历程……………郭景珊 (1)
☆→→→☆	

受命出关 策动抗日

——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组建经过……………黄宇宙 (23)
劳工血泪……………张宝玉 (35)
我当伪国兵的亲身经历……………刘树德 (38)

☆→→→☆	陈先舟同志传略……………李文学 (42)
人物	壮志未酬尽 捐躯为人民
春秋	——记抗联一军一师参谋解麟阁烈士
☆→→→☆	……李 戎 王明玉 于发中 (50)

为国为民 名留山村

——栾学春村长事略……………单明生 (63)
马家父子……………孙长礼 崔忠善 (70)
程斌叛变前后……………李 戎 (79)
大刀会司令王东山……………张凤浦 (86)



- 桓仁反袁独立及其失败……………陈长河 (93)
- 兰六攻占桓仁城的前前后后… 陈长河 (103)
- 日伪时期桓仁机构简介…………… 白尔杰 (113)
- 日本侵略者在桓仁的罪行… 王明玉等 (121)



- 桓仁铜锌矿开发简史…………… 王学良 (135)
- 桓仁水田开发溯源……………赵玉森 邵文津 (144)



- 桓仁解放前后医药卫生行业… 初传庸 (148)
- “万户萧疏鬼唱歌”
- 日伪时期疫病流行记述……………
- ……………张凤浦 初传庸 (162)



- 抗战歌曲三首……………白冰 文学 (165)
- 抗联歌谣八首……………张成礼 文学 (168)



- 富尔江史话…………… 王从安 (172)
- 桓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苏长清 (181)
- 毛克铜印…………… 邵文津 (184)

桓仁誓师讨倭敌

——回忆辽宁民众自卫军举旗抗日的战斗历程

郭景珊

编者按：郭景珊，字俊杰，现在是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沈河区政协委员，今年已九十岁。这位原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发起人之一，当年抗日战场上的将领，现在与花卉为友，安度晚年。他身体健壮，记忆清晰，声音宏亮，还具有年轻时的爽朗性格。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唐聚五为首的爱国志士，在桓仁举旗抗日，成立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于是辽宁以东广大地区燃起了抗日怒火。这支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与日寇血战两年多，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我是抗日自卫军的发起人之一，回首当年战事，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秘密组织 筹划抗日

我原籍是辽宁台安县人，在奉军二十七师教导营毕业，曾充二十七师十七团三营中尉排长，又转第六

旅任上尉副官兼卫队连连长，后升调十一军卫队营当营长。以后十一军解散，全营调到第三、四方面军团卫队旅第四团，担任第一营营长，这时唐聚五是第二营营长。我和唐聚五很有交情，结为盟兄弟。一九二八年东北军缩编，我被调到同泽新民储才馆警察班学习。一九二九年后，任沈阳县公安大队长。不久，又调到桓仁县当公安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看到东北的大好河山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心情非常悲愤。我在年青时代读过《国事悲》、《英雄泪》等进步书籍。《英雄泪》中，描写了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事迹，点燃了我强烈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怒火，心中产生了举旗抗日的念头。恰在这时，唐聚五被张学良副司令委派担任东边镇守使署第一团团长，也到桓仁来接任。老友重逢，颇有沧桑之感。

唐聚五对我说：“一团团长姜全我投敌了，我是团附，不愿附逆，就秘密地到北平晋见张学良副司令。张副司令听说姜全我投敌非常气愤，立即给我一份委任状，叫我接任第一团团长，速回东北，相机行事。

于是我又潜回山城镇去见于芷山，于见我有张副司令的委任状，就叫我到桓仁接任第一团团长。因为该团驻安东的第二营被姜全我控制，我只能接管驻桓仁第一营和驻新宾的第三营。”唐聚五是个聪明能干的人，中等身材，肩宽体胖，当年虽只三十五岁，可颇为同僚倚重。他心思沉重地对我说：“我看于芷山这个人靠不住，我们做部下的应如何是好？”当时我觉得，国难当头，无所是从，对唐聚五的谈话，深有同情之感。我们虽没再说什么，却已是心照不宣了。

一九三一年农历十月中旬，唐聚五邀我到桓仁县城东山坡袁家参园买人参。到参园后，他见左右无人，便小声对我说：“俊杰（我的字），买参是假，我想跟你研究一下局势。咱们已面临国破家亡的局面，做为军人，守土有责，你看怎样才好？”我当时说：“甲洲（唐聚五的号），我想打日本，但这不是小事，应从长计议，咱们得详细研究办法。”

农历十月十八日那天，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去找唐聚五，正好他一个人在家，我们俩就谈了起来。唐聚五说：“我就两个营，你手下一个大队也不过是一个

营，总共不足二千人，能打日本吗？”我说：“甲洲，我可以联络，辽宁五十八个县的公安局长和公安大队长，差不多全是我的同学。”唐聚五高兴地说：“真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事不宜迟，你就着手联络，但事属机密，可要慎重，抗日救国有杀身之祸啊！”

开始联络时，我首先想起宽甸县公安局局长时远岫同学，为人忠义，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激励他同我们一道率部抗日。为了不犯相，我又准备了人参、鹿茸和两瓶好酒。把我的外甥陈自周叫来，他是公安大队的骑兵队长。我说：“自周，你为我骑马去趟宽甸找时远岫局长，表面上是给他送礼，实际是要你探询一下他对时局的看法，如果他打算抗日，你就把信给他，等他的答复”。第二天我等得焦急的时候，自周一身汗水满脸笑容地跑进来，高兴地对我说：“舅舅，事办成了！”我问：“时局长同意了？”自周说：“同意了。我把礼物送给他，他说，‘你舅舅真是多余，国难当头，哭笑不得，还送什么礼物，安慰故人’。我还未说明来意，他就先讲了看法，于是我把信交给他，他看完信高兴地说：‘你快回去，既然

你舅与唐司令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绝对从命，愿听调遣’ ”。

时远岫的回答，使我有了信心，于是我又如法办理。二十二日，派分队长刘振海（我的姨兄）去辑安县见公安局长林振清同学。林表示，抗日的事不能旁观，过几天派人到桓仁联系。次日我又派公安大队庶务员郭春田（我的侄儿）到抚顺找公安大队长李振山同学。李说：对抗日之事我坚决响应。人同此心，没过几天，辑安县派袁亚东，宽甸县派赵督察员，抚顺派李督察员等来桓仁询问行动日期。唐聚五看到人越来越多，高兴地说：“看来抗日的事，是人心所向”。随后他抓起电话，叫李春润快来。李春润是唐聚五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驻新宾，又是唐聚五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李春润第二天骑马来到桓仁。唐聚五指着 我，对李春润说：“郭大队长和我打算起来抗日，已经有几个县公安大队同意了，老同学的意见如何？”李春润说：“我当然听团长的命令”。

一九三一年农历十一月七日，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救国会派秘书黄宇宙，到桓仁县见唐团长，当时我也

在场。黄宇宙说：“我这次奉救国会的指示，带张学良手谕到东边道各县联系抗日活动。”黄接着介绍了救国会组织，说主持会务的常委有卢广绩、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王化一、彭振国（小秋）、黄显声、熊飞等人。张学良的手谕是写在白绸子上的，为防日寇搜查，藏在棉裤里。黄宇宙还说：“我先到山城镇见过于芷山，他心怀鬼胎，看样子不赞成。我又找二团长廖弼宸，他的态度也不明朗。我到通化找县长裴焕星，裴推托说：‘我是文人，没有能力抗日。’这时二团团附孙秀岩进来，裴说：‘他是军人，你和他谈谈吧，我向孙谈了抗日之事，孙十分赞同，并表示要坚决抗日。’唐聚五说：‘黄老弟来的正好，我与郭大队长已有抗日准备，现在又有张学良的手谕和救国会的支持，我们的信心更足了’”。

一九三二年农历正月十五，黄宇宙又来到桓仁。他说：我走了几个县，临江县公安大队长徐达三、森林警察队长王凤阁，都表示要抗日。另外，清原中学校长包景华，本溪中学校长刘克俭，新宾旺清门校长王桐轩等，他们都赞成抗日，你们都应当去联系。”

黄又说：“我马上回北平，想法资助你们，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早见行动”。

我们正在筹划抗日之时，已经秘密投敌的于芷山还以我们的上级自居。一九三二年农历二月间，他命令唐团长到山城镇开会。唐聚五问我怎么办？我说这明明是请君入瓮，但不去又不好。后来唐聚五派中校团附唐玉振代他去开的会，会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过了几天，于芷山派第二团团长廖弼宸做说客来见唐聚五，说什么“镇守使也同意抗日，不过要等等看看，希望你们不要着急。”当时，我们坚决不承认有抗日之事，于芷山的诱骗未能得逞。

我见抗日举旗之事有了眉目，一天对唐说：“咱俩发动抗日成败不一定，我想把家眷送北平去，以免除后顾之忧，你意如何？”唐很同意。遂于次日晚用大车将家眷送走后，桓仁县长刘铮达和公安局长张宗周二人到团部问唐团长，唐聚五激动地说：“刘县长、张局长很对不起，我同郭大队长和他的一些同学都想起来抗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现正在秘密筹划，还没对你们讲，你们怎么打算，由你们自己决定

吧。”刘、张二人都有爱国之心，闻说之下，都很激动，表示跟随我们抗日。不久也把家眷送走了。

一九三二年农历三月十日，我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唐聚五、郭景珊、唐玉振、文禄、刘铮达、张宗周、马子和、富光圭等。会议研究确定了下面一些事情：

1、决定于四月二十一日举旗抗日，并举行示威游行；

2、决定由张宗周、唐玉振、郭景珊三人起草军纪二十一条；

3、决定军队名称为：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后在张学良加委时改为辽宁民众自卫军）；

4、决定设总司令一员，各路司令，支路司令若干员；

5、决定制定总司令部和各路支队编制表；

6、决定起草电文通电全国；

7、决定起草告民众书；

8、决定起草告武装官兵书；

9、决定起草印刷布告送交各路各县于起义后张

贴：

10、决定向国联调查团报告，伪满洲国成立是压迫民意，不承认它；

11、决定制定自卫军总司令部、各路及各支队的大旗及关防印章等；

12、决定印刷委任状及官兵臂章；

13、决定制定总部编制表，设总司令一员，副司令二员，总参谋长一员，总部设十个处，各路和支队设八个处；

14、决定设立桓仁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

15、决定设立自卫军民众银行，印制军用票，用作自卫军军饷及制服用。

会上还决定了各县财主的私人枪支按册收缴归自卫军使用，枪支按价付款。在会上我还提议，印的军用票，每县不分大小各赈款四万元，发给贫困人维持生活。

农历三月十五日，我们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除唐聚五和我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张宗周、刘铮达、唐玉振、文禄、李春润、孙秀岩、姜中天、富光圭、

裴焕星、林振清、王育文、时远岫、韦仲达。这次会议研究决定：

1、设立辽宁民众救国委员会，常委五人，委员若干人；

2、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凡自卫军司令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设常委五人；

3、设立政治委员会，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各县县长均为政治委员会委员。

桓仁誓师 起而讨逆

我们是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举行誓师大会的。在桓仁县师范学校操场设立会场，搭的松枝棚讲台，上面挂着“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誓师大会”的横额。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均执标语小旗。大会由我担任总指挥。开会时，鸣炮三声，接着升旗奏乐，鼓号齐鸣。我在致开会词以后，首先提议选举自卫军总司令。话声一落，群众高呼，一致拥护唐聚五为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唐聚五上台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天下事最痛心者莫过于亡国。日本强占我东北

三省，生灵倍遭涂炭，凡有民族气节者，怎能容乱猖獗。今天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就是肩荷光复河山的重任，毁家纾难，与日军血战到底，不驱逐日军决不罢休。说到这里，唐聚五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后来自卫军臂章上就写的这八个字）。

这时，群情激愤，高呼口号，真如山崩海啸。学生和群众都要求参加自卫军，一时报名的达几千人。在大会进行中，有一名朝鲜学者金东耳，跳上讲台，痛斥日本吞并朝鲜国土杀戮朝鲜同胞的罪行，又一次激起群众的愤怒。会场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震地动天。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绕桓仁县城一周。唐聚五骑着我送给他的大黄骠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夜里，县城灯火经久不熄，人们更深难眠。

游行后由唐聚五召集会议，成立辽宁救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同时组成自卫军临时司令部指挥一至十九路军。当时的组织情况是：

救国会，常委五人：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委员十四人，除常委五人还有：刘铮达、唐玉振、李春润、孙秀岩、富光圭、裴焕星、苏显扬、姜中天、文禄。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唐聚五。委员七人：唐聚五、张宗周、黄宇宙、郭景珊、李春润、孙秀岩、唐玉振。

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王育文。委员七人：王育文、韦仲达、裴焕星、苏显扬、刘铮达、姜中天、富光圭。

誓师大会后，自卫军向全国发出通电：“昊天不吊，日军内犯，焚杀淫掠，横施蹂躏。半载以来，迄无宁日；且复威胁溥仪，建造伪国，强奸民意，勒令服从。灭朝鲜之故技，重施于我，凡有人心者，谁不义愤！聚五等分属国民，兴亡有责，职为军人，尤须杀敌。今而不举，更待何时？况荷国家之重任，受人民之委托，大义所在，万难苟全，今择四月二十一日，爰整所部，与民众联合，共同一致，起而讨逆。国难当头，人必奋勇；仇不戴天，誓必歼敌。临阵之际，弹

尽则短接，刃折则肉搏，渴饮敌血，饥餐虏肉，前则仆而后则继，不灭叛逆，誓不生还。光武一人，犹能中兴；楚余三户，终亡秦国。我东北民众三千万，人具救国之心，士怀杀敌之志，痛饮黄龙，指日可期，还我河山，克日可待。倚马布怀，不尽一一。诸希亮察”。

为了发展和巩固自卫军，我们还做了许多组织工作。如成立地方银行，印刷地方流通纸币，前后发行八百万元；收缴地方民间武器，以解决武器之不足；修抗战粮库，在临江、抚松两县的山洞，储存了足够的粮食；建立了兵工厂和被服厂；修筑防御工事及交通道路；救济死难官兵家属，每县拨款四万元；派李季为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代表自卫军与各方联系；在通化北山玉皇阁和桓仁县城分别建立昭忠祠；成立了卫队营；制定了《军纪二十一条》。后来，我们还呈国联调查团《呼吁书》两次，曾在南京、北平广播电台广播过。

血战辽东 奋勇杀敌

桓仁县誓师大会后，通化县十六路司令孙秀岩召

开了地区性的自卫军誓师大会。接着新宾、宽甸、辑安、清原、临江、抚顺、本溪等县的各路军，都相继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这样一来，我们的抗日行动表面化了。这时于芷山撕下了假面具，公然向我们进攻。农历五月份，自卫军总司令部由桓仁迁到通化。通化地点适中，交通便利，颇有战略位置。其他各路司令都占据一个县的地盘，唯有我第七路随总司令部行动，专作战术策应，没有固定驻地。

我们到通化以后，李季从北平回来，向唐聚五报告了北平的情况，说他和张学良将军、救国会联系的都很顺利。对迁到北平的家眷，每家每月给五十元生活费，每人每月给三十斤大米。在李季回北平时，还把唐聚五和我，还有张宗周、孙秀岩、李春润等人的照片，召开大会的照片以及各路军的战斗事迹等情况秘密带到北平，平津各报把东边道抗日的消息和照片都登在报上，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自卫军血战辽东，奋勇杀敌，究竟一共打了多少仗，这是无法计算的。唐聚五和我经历过二十多次战

斗，若把各路都算上，二年多大小仗不下百次。我亲自参加的大战役有这么几次：

新宾城大捷 于芷山投敌后，他以为自卫军刚刚成立，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便轻举妄动，在农历四月中旬率第二团廖弼宸部和机枪、迫击炮连等约二千人，由山城镇出发向新宾进犯。驻新宾的第六路司令李春润未冒然迎敌，转移到城外。于芷山轻易地占了新宾县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李春润急电唐聚五求援。唐总司令立即派我率第七路自卫军增援，我到新宾城郊与李春润接头，随即决定由六路进攻县城西、北两面，由七路进攻县城东、南两面，约定在县政府会师。正当我们分头攻城时，有一个叫李玉清的（于芷山的少校参谋）求见，见到我就跪下说：“于镇守使希望双方言归于好，请你高高手。”我说：“什么于镇守使，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与他势不两立。你给我滚蛋！”这小子狼狈地跑了。六、七路军，四面拥上，冒着弹雨，奋勇攻城。七路二十团连长王玉廷身先士卒，率领全连战士猛攻东门，不幸牺牲城下。全连士兵大为愤怒，他们喊着为连长报仇的口

号一拥而入，敌军仓皇逃跑。与此同时，六路也攻进城内，司令李春润的左手被打伤。这一仗大获全胜，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三八步枪数百支，子弹万余发，伪军投诚二百多人。

两战牛毛坞 农历五月，于芷山又纠集第二团约两个营的兵力和一部分地方武装，以姜全我为司令、徐文海为副司令，侵犯宽甸县的牛毛坞。唐聚五得到于逆来犯的消息后，就召集我和五路司令张宗周、十三支队司令王东山商讨作战方案，并委张宗周为前敌总指挥。五路军全部兵力攻东面，七路军全部兵力攻北面，十三支队攻西面。本来以为可以一举攻下，谁想到王东山所部多数是大刀队，武器不济，抵不住机枪大炮，竟擅自撤退，七路、五路受其影响也退下阵来。我们七路被围在老道岭一个高地上，两天两夜断水断粮，战士们和我渴得无奈，只好喝自己的尿。在这次战斗中，一个炮弹炸死了我的副官段振芳。直到第三天早晨，第一路司令唐玉振率部赶来增援，我们内外配合，激战四个小时，打退敌人，把牛毛坞夺了回来。第五路参谋长官长海身先士卒，闯进敌阵，英勇牺

牲。以后又在农历九月间，敌军又一次侵犯牛毛坞，血战四昼夜，敌人惨败逃窜。

辑安速决战 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在辑安县城又打了一次胜仗。日军由朝鲜满浦出兵，配合伪军李寿山部包围了辑安县城。驻辑安的八路军司令林振清电告唐总司令。唐又命令我担任前敌总指挥。我率七路全休官兵和卫队师史长荣旅，连夜驰援辑安，走了两天到达辑安石庙子，与林振清司令相见。经研究后，凌晨三点，分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八路军林振清率先从东门攻入县城，立即占领了县政府，敌人万没想到我军如此神速，仓惶失措，逃出南门，辑安之围遂解。这次战役林振清和参谋长盛御风指挥有方，得到唐聚五总司的奖励。此战虽速战速决，但双方伤亡都很重。我方缴获三八步枪三百多支，子弹数千发。

这几次胜仗，已使敌人胆战心惊，而我军战斗情绪倍增，抗日活动得到了很大发展。

同仇敌忾 军民一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张学良将军和北平的东

北民众救国会，特派石培基、康乐三、秦喜麟等人，潜来通化送委任状，加委唐聚五为辽宁省主席兼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上将衔），并加委张宗周、李春润、郭景珊为自卫军第五、六、七路司令，因为这三人在桓仁首先起义的，其他路军司令的委任状，以后也都陆续送来。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通化自卫军总部举行了省主席宣誓就职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总参谋长张毅，各路司令唐玉振、张宗周、李春润、郭景珊、包景华、王相轩、梁锡福、文禄、英若愚、孙秀岩、林振清、王凤阁、邓铁梅（派代表）刘景文（派代表）魏荫楼、高佐臣、丁育昌、姜中天，关向阳、夏福兴、李相阁、赵新民、盛御风、高百祥、宋国荣、卢崇田、李振山、李月林、时远岫、常永林、文殿甲。另外，通化县长裴焕星、辑安县县长苏显扬、桓仁县长刘铮达、政治委员长王育文、委员任致远、韦仲达、富光圭、姜中天，通化县教育局局长杜凤庭，通化县水利局长高惠民，以及北平救国会来的客人和总部各处长等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张毅参谋长主持，首先是宣誓就职，唐聚

五穿着上将军服，在热烈的掌声中朗读了誓词并讲了话。他说：“张学良副司令委我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自卫军总司令，是对我的高度信任和重托，自认能力甚微，唯恐有忝厥职，希望各县县长各路司令，对聚五大力督促，同心协力，誓死率领东边道民众，打败日本侵略者，以谢三省父老。聚五不才，愿与诸公共勉之”。会上我提议由张宗周为自卫军副总司令。然后，全体举手通过。

在大会上，北平的救国会宣布：为慰劳官兵，捐赠现金一万元，暂存李春润处。刚说到这里，来了一个马龙骧。我和唐聚五离开会场去接待他。因为马龙骧以前在东北三、四方面军团卫队旅当第四团团长时，我和唐聚五都是他团的营长。但没想到他是受于芷山派遣来劝降的。我和唐立即拒绝，并将马龙骧扣押在宪兵司令部。以后自卫军总部向热河转移时，马乘机溜掉。

处理完马龙骧事后，接着举行了东边道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会上首先总结了前一段抗日工作，由于军民一心，打退了敌伪军的窜犯，收复了东边首二十一

个县，各路官兵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按发放臂章数统计的）。

这次会上通过了辽宁省政府的编制，选出省政府委员十三人：唐聚五、张宗周、王育文、裴焕星、苏显扬、杜凤廷、高惠民、郭景珊、李春润、孙秀岩、邓铁梅、刘景文、刘铮达。又选出：

民政厅长：裴焕星（原通化县长）；

财政厅长：苏显扬（原辑安县长）；

教育厅长：杜凤廷（原通化教育局长）；

实业厅长：高惠民（原通化水利局长）；

民众抗日银行行长：刘铮达（原桓仁县长）。

同时任命了各县县长（名单略）。此外，自卫军也增编了二十至三十七路军并委任了司令，还委任了其他官职。

在大会进行期间，日军飞机连续轰炸两次，炸死炸伤老百姓二百余人，房屋被毁百余间。参加会议的仁人志士，对此莫不怒火中烧，同仇敌忾。唐聚五以省主席名义发表了《告东北父老书》。唐当时通令东边道二十一县的机关、团体、学校、商工各界一律悬

挂青天白日旗，一致对外，杀敌讨逆。这消息一传出，平津各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辽宁省政府成立的消息和《告东北父老书》。极大的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士气。

会后，全体照像留念。后来这张照片被伪满警察弄到手，然后按照片抓人。

日本侵略者听说成立了辽宁省政府，大为恼火，关东军曾用飞机撒传单，重金悬赏捉拿抗日将领。通缉令说：有拿获唐聚五者，赏五万元；拿获郭景珊者赏三万元；拿获各路司令者赏二万元、支队旅长一万元。

自此，唐聚五声威大振，抗日队伍扩大了，但深感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不足。唐聚五曾发出求援通电，除关内各地外，东边道的人民也自动向自卫军捐钱捐物。桓仁县农务会长牛春宜捐高粱米二万斤；商务会长宋佐忱捐高粱米二万斤，白布二十匹；江北烧锅经理王玉亭捐战马十匹，高粱米五千斤；桓仁镇福记号经理王子金捐献白布十匹；通化县烧锅经理严玉亭把三百只梅花鹿献给自卫军；桓仁县有两家私立

医院院长刘同仁和都鸿达向自卫军申请愿把医院改为自卫军的后方医院，治疗伤号。那时，我也捐献三千元，买白色和蓝色串绸做军旗和委任状及臂章之用。

当时，总司令部的大旗，三尺见方；各路司令部的旗二尺八寸见方。都是用白、蓝串绸做的青天白日旗，旗边用红丝绒穗。旗上写着某某司令部字样。

总司令部关防三寸二长、二寸宽，各路司令关防二寸八长，二寸宽。另外都有小官印，上面刻的全衔和司令的名字。

老百姓还主动地帮助自卫军修筑一条由桓仁到通化全长一百八十华里的公路，当修到滴台岭险要处，军民费了很大劲。修完后大家一致主张把滴台岭改为唐公岭，以颂扬唐聚五抗日壮举。

辽宁民众自卫军在两年多的血战辽东的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得到了辽东一带人民的热烈支持。在战斗中有多少英勇的中华儿女，血洒战场，又有多少人民群众冒着破产和杀头的危险支援自卫军。

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受命出关 策动抗日

——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组建经过

黄 宇 宙

编者按：黄宇宙同志，又名黄毅。系河南省新野县人。今年85岁，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受东北救国会委托，三次来到桓仁，与驻桓仁的东北军团长唐聚五、公安大队长郭景珊等共谋抗日、组建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

现已退休，居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省文史馆名誉馆长，发挥余热，续写春秋。

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东北人民的义愤。从东北逃亡到北平的军政要人，老一代的爱国前辈，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师生及北平的爱国人士等，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救国的洪流。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北平的爱国人士约

千余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于设在北平西城区旧刑部的奉天会馆内，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发起人有：

王卓然（字迴波，辽宁省抚顺县人，美国留学生，任东北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后为代理校长）。

阎宝航（字玉衡，辽宁省海城县人，英国留学生，任辽宁省中华青年会总干事，中华拒毒会辽宁省分会负责人）。

车庆和（字向忱，辽宁省法库县人，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毕业，任辽宁国民常识促进委员会主委）。

卢广绩（字运赓，任辽宁省工商总会副会长）。

彭振国（字小秋，陆军大学毕业，曾任东北军军长等职）

黄显声（字警钟，辽宁省凤城人，东北讲武堂第三期毕业生，曾任东北军旅长，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等职）

熊飞（字正平，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旅参谋长、旅长，省督察长等职）

王化一（东北中学校长）

张德厚（字希尧，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大学理工

学院学生)

朱焕阶 (辽宁省工商日报社总编辑)

陈风生 (字柏林, 东北大学学生)

郝克 (字克勇, 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学生, 辽宁省
中华青年会干事)

张雅轩 (字金辉, 东北大学理工学院学生)

还有徐仲航、金哲忱、巩天民、张韵冷、宁匡
烈, 夏尚志、高崇民、黄宇宙等。

经过选举, 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九人: 阎宝航
(主任委员)、车向忱、卢广绩, 高崇民、彭小秋、
黄显声、王化一等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有:
王迺波 (主任)、陈先舟、张德厚、黄宇宙、张雅轩、
陈风生、朱焕阶、熊飞、宁匡烈、夏尚志、徐仲航、
郝克勇、金哲忱、巩天民等二十一人。

救国会下设政治组, 组长阎宝航; 军事组, 组长
彭小秋; 总务组, 组长卢广绩; 宣传组, 组长王化
一。以后根据工作需要, 将组扩大为部。救国会分为
五个军区: 辽西、辽南、辽东、辽北、热边分别为第
一、二、三、四、五军区。

当时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武器弹药、粮食等，主要由张学良暗中供给，其余则来自各方面的募捐。救国会一方面积极准备军事活动，另一方面发出“抗日纲领”，积极向国内外宣传。

二、欣然接受出关任务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前夕，九月二十日，王卓然、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夏尚志、张德厚、宁匡烈等救国会主要成员共同商量。鉴于我在北伐革命时打过仗，前几年，同东北大学的学生张希尧等化装成工人，在铁岭马蓬沟破坏了日军在辽河上游的兵营建筑工程，并在各县从事过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禁吸鸦片等工作。并商请少帅（张学良）同意，决定让我到长白山区发动军民建立抗日根据地。我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因为当时我刚结婚不久，车向忱等让我与家人商量一下。我回家同妻子郑城说明此意，她以国是为重，欣然同意，并表示愿同赴东北。当天我们又到北平彰仪门36号岳父郑浩然老先生家请教。郑老先生更诲以国家民族大义，全力支持。并愿将女儿接回家住，以免我后顾之忧。又

拿出作为一个穷教授节俭下来的五十元薪金，让我和妻子到救国会表示全家的心愿。阎宝航、车向忱、张德厚等同志表示感激之情。还对我的行程作了周密安排。

送妻子离救国会回家时，车向忱、张德厚把我叫到一边，车掏出一封信说：“王迥波老师让我转给你一封信，正午十二点前，同赴顺承王府去见张副司令。”我们拆开信一看，这是写在白绸子上的一封盖有公章和私章的信，内容如下：

辽、吉、热、黑军政民钧鉴：

兹派黄宇宙秘书前往代为问候，并协助组织联防部，以防胡匪。

张学良

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于北平

正午十二时，我和车向忱、张德厚一起来到顺承王府的大门前，王迥波老师正在门外等候我们。我们在王老师的办公室稍坐片刻后，王就陪同我们去见张学良将军。经王老师把我的姓名、学历及“九、一八”前，在东北同车向忱、张德厚等所做的爱国抗日工作等做了介绍。张说：“出关抗日，生死莫测，但为国

捐躯，虽死犹荣！……你见到东北军、政、民等方面人士，就说我张学良派你去问候他们，问问他们能不能抗日，有多少人、枪。详细调查回来后，好根据情况，计划抗日，打回老家去。万一这封信被日本人搜查出来，你就说是为了防止胡匪，千万不要说出‘抗日’二字，以免日军借口找麻烦”。王迥波老师说：

“诸葛一生惟谨慎，望宇宙要大胆心细，相机行事，早日胜利归来。”我回答说：“一切按命令办事！”在抗日工作上，我是抱着：生在河南，死在东北，不歼日寇，誓不生回的决心，以报答国家对我的培养和信任。在我临行前，张学良还通过王迥波老师转给我两千元路费。我因路途遥远，携带不便，钱多了更易惹祸，我只拿了二百元做路费。

是日下午四时，车向忱、张德厚从估衣店买来黑夹袍一件，夹裤一条，宽双脸布鞋一双，毡帽子一顶，钱搭子一个，算盘一个，还拿了一个旧帐本。并叫我连夜学习打算盘的口诀，化装成商人，将张学良的亲笔信，缝在夹裤腰内。还在北平华北大学找了一位叫李连波的同学同行，并由华北大学写了护照，证

明李回临江探亲。

三、踏上征途处处有艰险

农历九月二十五日我同李连波乘车到了山海关车站，住在车站附近的悦来栈内。次日早换乘出关火车，我们不敢在大站下车，多坐了一站，在沈阳以北的一个叫虎石台的小站下了车。为了避免交通沿线敌人的搜查，我同李连波忍饥挨饿步行来到了海龙县山城镇，见到了张学良的旧部，东边镇守使于芷山。

我说明来意，并把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于芷山看时，他拍案大骂说：“世界上那有用白绸子写信的？他妈的，想来骗我是不行的。”把信扔在地上，我拾起了信，对于芷山说：“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东北的老百姓都要为中国人争气，誓死不当亡国奴，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封信，是不是少帅写的？”于芷山说：

“我不识字！”我说：“当年张作霖出生入死，招兵买马成立队伍，提拔你当上了镇守使，至今你就忘了张大帅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了吗？我是个大学毕业的学生，怕死不敢来见你。”于芷山转变了口气，冷笑了几声问我吃饭了吗？我说：“没有”。于芷山便

叫副官带我到副官处吃饭。实际上是把我不放起来了。给我带路的李连波见此情景，明知凶多吉少，对我说：“没料到有张学良的亲笔信，还这么困难，我先回家去，到县里再想办法托人来营救你。”

李连波走后，我一个人在副官处里，思前想后，多方考虑这个胡匪出身没有丝毫民族气节的于芷山，硬说我拿的是假信，是骗子，真弄个“出师未捷身先死”……。正在这时，有一个身穿呢子制服，左胸前别着东北大学校徽的人，走到我身旁，问起我的来历。我都具实相告，并且拿出张学良亲笔信给他看。他阅后非常激动，连声说：“是，是我们校长的亲笔信。”我问他贵姓，他答姓张^①，我又问名字的贵称，他没有回答就急忙拿着信，找于芷山去了。不料，约二十几分钟他满面愁容地回来了。我估计准是碰了钉子，他把信交给我说：“你多保重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完他转身走了。我想对于芷

①编者注：据《辽宁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175页载：张是于芷山秘书，名西珍。

山抗日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等一会天色朦胧的时候，我一定要乘机逃走，能够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也比死在于芷山的手里强得多。

吃晚饭时，勤务兵送来两菜一汤，一盘肉包子，比中午的两个馒头，一碟咸菜大不相同。我想，也许是于芷山照章办事，犯人在枪毙前给顿好饭吃。正在这时，那个东北大学的人来到我的身边，他望了门外没有哨兵，就低声说：“这里已投降日本了，顾问今天坐车去沈阳特务机关开会去了，后半夜一定回来，你必须在今晚十二点以前逃走，上半夜口令是‘和平’下半夜口令是‘建国’。你逃走后我就带兵对空射击，向东追你，你可爬在沟里不动，等没有枪声后，你再行走，你拿着少帅的手谕，在长白山区是能够组成抗日队伍的，到一定时机，我会到山里找你们，这十元钱给你作路费。”我问他的名子，他说：

“你不要问我是谁，只希望你一路平安，先到通化找廖弼宸团长，然后再到桓仁找唐聚五团长。”说完匆匆地走了。至今，我时常怀念和感激这位带有东北大学校徽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

是夜十一时许，我见到镇守使大门的两个卫兵坐在岗楼内打盹，我就蹑手蹑脚走出了营门。我看着天空的北斗星辨别方向。当我向东走了约三里路时，身后枪声大作，我马上跑进树林里伏在地上，在离我约一里远的地方，乱糟糟地嚷了一阵就回去了。

黑夜里走山路，忽高忽低跌跌撞撞，来到了一条公路上。刚刚松了一口气，忽听前边有人喝道：“口令！”。我发现有哨兵在前挡路，我马上回答：“建国！”。哨兵用枪对着我问：“你是那里来的？干什么的？”我答：“给你们长官送信来的”。哨兵说我答的不对，要把我捆起来，我再三解释，他们没捆绑我，让我站在离他们岗位约十多步远的地方，等到天明换岗时，由他们带我去见连长。此时饥寒交迫，疲倦不堪，可我不敢闭上眼睛打盹。我在想，如果碰上敌人，岂不是逃出虎口，又入狼窝！

天亮了，换岗的哨兵来接班，下班的那个哨兵带我见了他们的连长。谈话中得知，我到了廖弼宸的防区。连长问明我的来历，便领我去见廖团长。我拿出了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他看，他看过后沉吟了好一

会，非常为难地说：“于镇守使已投降日本了，我的防区距山城镇很近，实不相瞒，目前我不敢抗日，但我廖某决不妨碍黄秘书工作，我派人送你到桓仁唐聚五那里去吧。”我见此情景知道做工作也白费。于是答道：

“多谢廖团长，只派一个人给我当向导就行了”。

我来到桓仁，见到了驻守在那里的唐聚五团长。唐看着少帅的亲笔信，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抓住我的手说：“黄秘书代少帅来慰问我们，这太好了，再迟了我们都要被迫当汉奸了。”唐聚五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血气方刚的军官，言谈间我得知唐是讲武堂毕业生，是张学良的学生。当我谈起于芷山侮辱少帅手谕，不敢抗日的事时，唐拍案大骂于的叛国投敌之举。见此情景，我非常高兴。从此，我便以唐聚五为目标，开始了我的工作。

四、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的成立和发展

对唐聚五的策反工作是一拍即合的，岂不知他们已有酝酿。我这一来自然是及时雨了。在同唐磋商后，决定先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选出五名常委：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分会下设

政治、军事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内成立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桓仁师范学校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军民参加者约万余人。发展非常迅速，后来部队扩编为十九路军，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热潮在辽东十四个县掀起，鼓舞了抗日信心，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编者按：辽宁民众自卫军组建情况及活动参阅《桓仁誓师讨倭敌》一文。)



劳 工 血 泪

张 宝 玉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战争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对我国沦陷区的经济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

1936年，日本侵略者就开始进行浑江水利勘测；1941年1月，通过“佐藤株式会社”等殖民机构，垄断了浑江的水利资源，在桓仁县城北的牯牛哨修建水电站。

电站开工之后，日本侵略者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以骗拉、强征和抓捕等手段，从各地掳掠大批劳工到电站从事沉重的劳役。到1942年，就掳掠劳工2000多人。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和灾难。

我是1943年被抓到桓仁电站当劳工的，住在刘家沟那阴暗的水泥房里。我们每天每人只配给9两粮，大部分是橡子面，吃起来又苦又涩。我们小队60多人，担任从江心往10米高的坝基上抬土，每人每天的任务是3立方米。一天累得直打晃，略微慢一

点，被工头发现就拳打脚踢，还要罚跪。有个叫谢景昌的勤劳奉仕大队长，劳工们给他起个外号叫“谢扒皮”，他一到工地就横长鼻子竖长眼，非打即骂。我们大队的几百名劳工，都挨过他的打。

白天干10多个小时的重活儿，晚上睡在又潮又冷的劳工房里。夏天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破被子整天湿漉漉的，很多劳工生了疥疮。到了冬天更难熬，床铺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无奈几个人缩成一团，互相靠身体来取暖。屋子里，水盆中的水都冻鼓了。每个人都冻坏了手脚，严寒严重地威胁着劳工的生命。

有一天轮到我站岗，一个姓王的劳工，因受不了日本鬼子和工头的毒打，借外出小便的机会，光着屁股逃跑了。第二天，工头发现少了一个人，硬说是我有意放走的。把我带到大队部里，全身上下剥个溜溜光，反绑在一条长凳上，先往我的鼻孔里灌凉水，然后用皮带抽打，折磨得我死去活来。我死活不认帐，最后把我放了。日本人见我遍体鳞伤，便把我送进所谓的医院，一个医生端来一大碗黄色的苦水逼着我喝，我忍着苦涩，勉强喝了下去，头又胀又疼。打那

以后，劳工有病，谁也不肯上医院了。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劳工当人看待，劳工们过的是牛马生活，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有一次，围堰浇注混凝土，有两名劳工失脚掉到下面。日本鬼子站在旁边若无其事，无动于衷，根本没拿当回事儿，不但不管，反而强令继续浇注。

还有一天上午，从围堰外用卷扬机绞斗车时，钢丝绳断了，站在车上的8名劳工全都跌落下来，当时摔死4名，幸存者折胳膊断腿全是伤。日本鬼子却以此取乐，连说：“好玩，好玩”。

我在桓仁电站整整干了两年劳工活儿，被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回家后躺在炕上一年多，总算死里逃生过来了。一提起这两年的经历，浑身上下直打颤。那是两年地狱般的生活啊！

当时劳工们的斗争是以“磨洋工”的方式对付日本侵略者。到“八、一五”光复，电站修了5年，仅仅完成了浑江右岸的围堰工程。

劳工的血泪已经成为历史。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珍惜今天。

我当伪国兵的亲身经历

刘 树 德

伪满洲国康德8年(1941年)实施了“义务兵役制”，强征青年入伍，以充当日本关东军的附庸。

实施伪兵役制，共征集了五期，从1941年到1945年每年一期。征兵时由军管区和地方组成征兵机构，被征者填写登记表，进行身体检查后交首席征兵官，被征人站在台下，征兵官当场做出裁决，是合格还是不合格。当首席征兵官在台 上 喊“合格”时，被征者还得重复喊“合格”，如不喊或声音小点，就说你思想不好，就有被打或关押的危险。不合格的当时人们叫“国兵漏”，编为“勤劳奉仕队”，背井离乡充当无偿劳力。

我是第四期被征的“国兵”，1943年检查身体，1944年3月2日入伍。我们被征的二十余名，从桓仁坐汽车到通化，会同通化地区的被征者坐火车到安东(丹东)，到安东换上军装才知道自己的去处。我到的部队是第六军管区混成第六旅骑兵十九团

机关枪连。上了闷罐火车，经过两个昼夜到达了间岛市（延边），开始了似囚非囚的生活。

伪军内每天安排得很紧。早五点起床，起床三分钟后集合“点呼”，“点呼”后回来整顿内务、洗漱。六点开饭，早饭时间只有五分钟，吃饭时还有一套形式：坐好后由值星班长喊“举箸”，之后齐念一段日本话，大意是，饭是天照大神给的，要感谢天照大神。我们背地里给起了个名叫“攘食咒”，然后才开始吃饭，一碗饭几口就下去了，谁也不敢吃慢了，因为到时间班长要喊“退饭厅”，不管吃不吃完就得停下，一齐放下筷子退出坐位。饭后到出操的一点时间只许在屋里立正姿势坐着，谁也不许说话，象木偶一样。谁要上厕所需到兵舍门口，向屋里行个礼，并报告某某上厕所，回来时同样喊某某上厕所回来了。早七点到十二点出操。紧张地吃过午饭，下午一点到六点仍然出操，六点半吃晚饭。晚七点到九点是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并不自由，不是学习不着调的军歌，就是值星班长训话，或者是检查内务。晚九点就寝，还得等“值星司令”进行晚点呼后才能就寝，更使人难

以忍受的是每两天晚上还得轮一次“夜勤”，一个班一个小时，要是轮在就寝后第一个班和最后一个班算是幸运，最糟的是夜中间值勤，一个班前后总需两个小时才能睡觉。兵营中的生活实在难熬，睡眠不足，运动量大，尤其饭不够吃。有机会能轮值班喂马，可以偷点豆饼吃，但是吃多了不是涨肚就是跑肚。

伪满洲国兵的装备和编制，有其名无其实。伪满洲国设有十二个军管区，军管区司令都是中将或上将军衔，但其兵力只不过二、三千人，不及一个旅的兵力。第六军管区驻牡丹江，下属有：主力部队是步兵第八团，约一千人，大部分驻热河；留守部队驻宁安；还有混成第六旅骑兵十九团驻间岛市，直接受第六军管区辖制，因而混成第六旅只是空架子。这个骑兵团没有营编制，直属四个连四百余人，另外还有第二自动车队二百余人驻宁安，第六辎重队二百余人和一个炮兵营二百余人驻牡丹江。工兵营二百余人驻明月沟，司令部一个军乐队和通讯队百余人驻牡丹江。

在装备上，从门面上还可以看得下去。有三八式

步枪，以后又换上捷克式七九步枪，九二式重机枪，九六式轻机枪，山炮、野炮、迫击炮及掷弹筒等应有尽有，岂不知这些武器都是空筒子、烧火棍。原来日本人对伪军存有戒心，军火仓库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平时一粒子弹也不给。

一九四五年春，日伪已预感到末日到来，为做垂死挣扎，对伪国兵进行一次改建，将原骑兵团建制撤销，改编为步兵第三旅第七团移防牡丹江市八达沟，加上1945年春入伍的第五期国兵，也不过一千多人。下属三个营，九个连。这个步兵七团实际上也是空架子，仍直接受命于第六军管区。“八、一五”前夕，伪七团撤退的命令就是第六军管区直接下达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苏联军队攻进绥阳、穆棱，威胁牡丹江市。步兵七团向宁安方向转移途中，在七团副团长王秉询的暗示下全团哗然而散，跑到距牡丹江四十华里的蛤蟆塘住了几天，由苏军收容移驻海林，在海林又住了一段时间，才各奔他乡。

陈先舟同志传略

李文学 供稿

陈先舟(原名陈世元、陈世瀛)同志,系辽宁省桓仁县北甸子英英沟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清贫家庭,在拐磨子小学毕业后考入桓仁师范学校公费就读,毕业后在通化县任教,后赴日留学。他是东北地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安东省参议会议长,辽宁省副省长。他的一生对党对国家贡献很大。是东北地区有影响有名望的重要人物之一。

一、民国时期

陈先舟同志青年时代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屈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整订的停战条款、大连租借于日本期限由25年延长为99年的条约的斗争。被选为旅日三省旅日台胞学生会代长,回国参加了恢复旅日、大连的爱国宣传活动。

1921年回国后,先赴哈尔滨任哈尔滨市电话局

总工程师，东北电信管理处总工程师等职。曾设计建成沈阳和哈尔滨市内最早的有轨电车。

1926年爆发了北伐战争，他不满军阀割据，参加了国民党，并被推选为吉林省党部委员，曾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9年，被任为东北无线电台总台长。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他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卖国，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反动本质，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深恶痛绝，毅然脱离了国民党，积极投入到民众抗日救亡的洪流。在北平他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积极开展支援东北抗日救国活动。

1933年，他与高崇民等同志秘密组织“复东会”，继续宣传抗日，开展收复失地的斗争。第二年“复东会”被国民党反动派下令解散。在严酷的斗争现实中，他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信念，利用他在北

无线电台管理工程师的职务之便，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事通讯，在技术与人力方面均予以极力支持。为东北各路义勇军培训了四、五十名电讯人才，为中共地下党组织装配了两部秘密电台。在抗日救亡活动中，他逐步认清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共产党员南汉宸、杜斌丞的帮助、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1936年，他与南汉宸同志赴西安工作。不久，张学良将军将故意扣押重要电文、并向南京当局泄密的交通处长逮捕。随即任命陈先舟同志为东北军交通处少将处长。他控制电台后，积极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刘鼎等同志联系。在西安事变的当晚，他利用电台，及时向中共中央通报情况，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国民党背信弃义，张学良将军被扣留，东北军被改组、东调。陈先舟同志毅然离开军队，辗转 to 武汉，重又从事救亡活动。

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陈先舟同志被推选为该会常务委员。他在武汉经常参加游行、演讲，博得了爱国群众的好评，树立了较高威信。

1938年4月，经刘澜波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为了革命需要，从未公开党员身份，一直是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着党所指派的工作。

是年7、8月间，他参与了“东北救亡总会”创办《反攻》半月刊的工作，积极宣传抗日，相继搞了不少报告会，组织义演并为抗日军开展募捐和慰劳前方将士等活动，昼夜奔忙，忘我工作。他利用与国民党建立的特殊关系，得知国民党要扣押战地服务团的消息，便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情况，全体团员迅速安全地撤离了西安，抵达冀中军分区，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他十分关怀青年人的生活与政治前途，通过西安办事处，向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输送不少进步青年，为革命队伍发展壮大增添了血液。

1939年冬，“东北救亡总会”安西分会被国民党西安卫戍司令部查封。他由西安到重庆，在周恩

来、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他与东北同乡袁东衣组成“中国建业公司”，他任总经理（后改为董事长）。从此，他活跃在爱国进步人士之间，在掌握国民党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及时向党请示汇报工作，他经常往返于曾家岩15号（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住地），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

1940年他的儿女相继迁移到重庆，从此结束了独居生活。在家庭他生活简朴，从不追求生活水平的高低，却十分注重子女政治成长。经常检查辅导他们的学习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的学习，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在他的影响教育下，子女们的成长进步很快。当他们开始成熟自立时，经请示周恩来同志的同意，把三个儿女送回东北流亡青年队伍一起转送到革命圣地——延安，从事革命工作。

1944年，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以原“东北救亡总会”主要成员为基础，重新组成东北地方性的秘密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陈先舟同志为该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不久东北民主政

治协会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东北小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先舟同志奉命回到东北，任安东省参议会议长。

三、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解放战争中，他在哈尔滨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交通部副部长，东北邮电总局局长等职。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亲临第一线，组织通讯力量，做到了部队在哪里，他跟到哪里，电讯通到哪里，对解放东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解放后，陈先舟同志在恢复发展东北地区交通和邮电通讯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建设国际通讯线路工程中，他亲自担任总指挥，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毛主席与斯大林的直接通讯联络。

四、建国后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陈先舟同志历任沈阳市副市长、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历任民盟东北总支部常务委员，民盟沈阳市支部主任委员。

东北大行政区撤销后，民盟东北总支部随之撤销。相继成立三个省级盟组织。陈先舟同志担任第一届至第五届民盟辽宁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在民盟工作中，他紧紧依靠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调动全体盟员的积极性，为配合党的各项中心任务忘我地工作，胜利地完成任务。他平易近人、待人诚恳热情，在盟内有很高的威信。盟员都称他为“先老”。

在政府工作中，他作风朴实，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在绥中、锦州发生重大水灾期间，他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地深入灾区，推进抢险救灾进程，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及其辽宁死党制造一起所谓的“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假案，用法西斯手段对陈先舟同志严刑逼供，他身处逆境，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其他同志安全，表现了一位革命者的崇高品格。

1969年12月7日，陈先舟同志含冤逝世，

终年73岁。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1978年5月20日在沈阳市举行陈先舟同志骨灰安葬仪式。同年10月1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三万人大会，彻底推翻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假案，为陈先舟等90余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壮志未酬尽 捐躯为人民

——记抗联一军一师参谋解麟阁烈士

李戎 王明玉 于发中 供稿

解麟阁、字明勋，二户来小恩堡村人。1895年诞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父亲解丑、叔父解俊。解麟阁弟兄五个，他排行老四。家有良田百余亩，屋舍百余间，车、马、兽、禽样样有，是个富庶家庭。

热血赤子

解麟阁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十三念私塾，十七进学堂。天赋聪明，勤奋刻苦，常常背诵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著名词句。他的老师王天栋，知识渊博。向学生灌输商鞅变法，陈涉起义等进步思想。在王天栋老师的影响教育下，解麟阁产生了爱国爱民，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然而，家教甚严，父亲拘谨，先为他娶妻崔氏，崔氏生下两男而去世；再婚张氏，又生两男一女。

1922年秋，王天栋离校退隐。解麟阁继承王

老事业。开始是教师，后来当上桓仁县第五区村立第八小学校校长。任职后，教学质量较高，十里八村的儿童都来上学，学生人数倍增。解麟阁校长主张改进乡学，推广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先进教育方式，反对死读书，反对关门教学。他有亲戚在省城，从那里弄到不少《新青年》等杂志，经常对师生宣讲“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震惊中外的国家大事。因此，在青少年之中播下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种子。

此外，解麟阁还习尚武功，擅长骑马。每逢年节休假，会同寒窗好友，登山涉水野游，举行赛马、摔跤、练拳等健身活动。三十岁那年，乡村改制，附近的大恩堡村缺一村名村长，经乡民举荐，解麟阁荣任村长。当村长以后，经常与各区、各村官员往来。不久，他与桦尖子建道员李向山结下交情，且密切往来。酒后茶余，谈今论古，议国政，斥时弊，二人志同道合。

聚 义 抗 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报纸

揭露日军入侵东北的罪行，民众纷纷集会，掀起反抗日军侵略的革命浪潮。解麟阁痛感国家危亡，民族耻辱，毅然辞去大恩堡村村长的职务。乡民好友相继来到解麟阁家安慰。解麟阁面对大家，痛楚地说道：

“丈夫无国更何家？”群众劝他回村当村长，他严肃地说：“日军就要进村了，我才不当那屈村长呢！”。

庄稼上场后，解麟阁杀了一口猪，邀请乡亲们吃酒。来客还有邻近村庄一些亲友。众人济济一堂，十分热闹。解麟阁突然站起，开明宗义，他放开了喉咙讲道：“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十分感谢大家的盛情，今日邀请诸位光临寒舍，只有一事相商，不知大家能否赏脸？”大家伙七言八语，不知为了什么事？解麟阁随即阐明他要建立一支“爱国军”，发动群众参军。他说：“我们是有国度的国民。目前，人心之积患，乃日寇入侵。保国卫家，匹夫有责。奉劝乡亲参加我爱国军，做一个硬梆梆的中国汉，不可为倭贼豺狼之羔羊……”。话音刚落，立刻跳出二十几个青年人，齐声响应，争当爱国军。夜

深人静时，解麟阁告别乡亲，告别家眷，扛着自家老洋炮，率领有志青年进入牛毛大山的密林里，搭起窝棚，压起“抡子”，风餐露宿，开始了抗日生活。解麟阁放弃自家富裕的日子，踏雪披霜，决计消灭日本侵略军，可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山上生活得很乐观，向小哥们讲述许多英雄豪杰的故事。他说：“朝鲜有个民族英雄，名叫安重根，亲手杀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我们是中国人，是英雄国度的人民，难道我们不会去杀掉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吗？”大家听完他的一番话，齐声回答道：

“我们也要当安重根！”。爱国军周旋于高山大川，深山老林，曾与李向山带领的山林队“老家亲”相遇。解麟阁与李向山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密切配合，相互支援，成为同命运，共甘苦的盟军。

壮 志 难 移

1932年4月21日，东北军驻桓仁的团长唐聚五起义。解麟阁欣喜若狂，志愿投靠辽宁民众自卫军。他在二户来街拜会了一路军司令唐玉振，被唐玉振司令任命工程兵团中校团副。解麟阁带

领本团战士，在桓仁与宽甸交界地，挖战壕、修工事，积极为战斗创造有力条件。有一次，徐文海白帽队从山下冲了上来，解麟阁以锹当枪，砍得敌人血肉横飞，打得十分勇猛。从这时起，大家热情地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四虎将”。辽宁民众自卫军受挫后，解麟阁毫不甘心，拉回原来“爱国军”，进行重新整顿，队伍扩大到近百人，声望大振。

1933年秋：解麟阁派人去辽阳购买武器，获悉共产党将领杨靖宇在磐石玻璃河套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而且开始南进，开辟新游击区。解麟阁的内心十分喜悦，马上叫儿子解吉庆去柳河，找“老长青”，探听虚实。儿子临行前，解麟阁再三嘱咐快去速归。儿子走后，解麟阁日夜盼望，一直等了几个月，儿子仍然杳无音信。春节临到，终于接到儿子的回音。原来，解吉庆到了柳河，就跟着“老长青”到杨靖宇警卫连，当小红军去了。

1934年春，杨靖宇率独立师司令部、教导团和政治保安连，从打牛沟三岔河开赴到桓仁仙人洞。杨靖宇派李向山去二户来的小恩堡，说是想见见解麟

阁这样一位红军家属。解麟阁心情激动，热泪横流，星夜奔赴仙人洞。他看到秧歌队，吹吹打打，载歌载舞，热闹非凡。他看到了杨靖宇，正站在土台子上给群众讲话，宏亮的声音振荡着解麟阁心弦。他清清楚楚地听到：共产党坚决抗日，而且团结各个抗日武装，要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的江山。群众大会结束，解麟阁在李向山引荐下，拜见杨靖宇。杨靖宇握着解麟阁的双手，给他拜年，递给他一支香烟，亲切地称呼他“老解同志”。接着唤出解指导员，让解麟阁认一认。解麟阁一见那位解指导员，从头到脚，全是红军打扮，认出了自己的儿子。他高兴得朝儿子的后背，猛拍了一巴掌。紧紧抓住杨靖宇的手，恳切地要求参加红军。杨靖宇对解麟阁早已了如指掌，认为他不同凡响，而是代表着上百名的“爱国军”，是一支不可多得的抗日武装力量。当即就批准了解麟阁的请求。并给了解麟阁一个重要任务，去瓦解伪公安队赵文喜队伍。五月末，解麟阁在李向山陪同下，到了大四平，通过拜把子，拉杆子，迅速打入了伪公安队，争取过来了大队副赵文喜。赵文喜拉出三十几个伪兵

哗变，投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被改编成农民游击队第一分队。

沙 场 猛 将

七月二十三日，杨靖宇准备到八里甸子地区收编山林队。解麟阁、李向山打先锋，首先到八里甸子区的柞木台子村，建立起反日会，选举刘春增当会长。杨靖宇率司令部随到，在刘春增大院住了三天。然后决定召集八里甸子、宽甸四平街一带山林队开会，发动抗日力量，联合起来，消灭铁杆汉奸邵本良部队。解麟阁多年的绿林生活，与这一带山林队打过交道，他把熟知的情况，全部向杨靖宇汇报。并自报奋勇，召集各匪队，到刘春增大院来。解麟阁很快把信息传到各处“抢子”。第二天上午，各路山林队头目，共一百二十多人，全部来到。其中包括“老北风”、“海乐”、“三省”、“天龙”、“靠山红”等帮头较大的头目。他们绝大多数是辽宁民众自卫军散落的余部，很快接受了红军改编，分成十二个团配合杨靖宇追击汉奸邵本良部队。就在八里甸子会议刚结束的时候，八里甸子警察署听说杨靖宇部队在柞木台子，便与县

日本守备队通气，凑合了七十多人，装扮到柞木台附近修道，向马鹿泡大河套进攻，企图包围杨靖宇部队。然而，杨靖宇料兵如神，早已安排了解麟阁及李双录率队设下包围圈。当日伪军洋洋得意开进西大河套时，四面八方，枪声响成了一片，打得敌人蒙头转向。解麟阁首先冲入敌阵，生擒日本守备队小队长秀乙。这场激烈战斗，打得日伪军出奇不意，缴获十五支马钩子枪，俘虏敌人三十多个。“四虎将”的雅号，于是又传开来。

虎 口 拨 牙

1934年秋，杨靖宇率部奔袭宽甸一带，追击邵本良匪队。临出发前，任命解麟阁为三团参谋长，同时任李向山为三团副官。解麟阁多智多谋，善于用兵，作战勇敢，成为一师副师长兼三团团韩浩的有力助手。11月间，三团在海清伙洛王本善家开会，解麟阁向韩浩介绍了二户来警察署情况。二户来警察署是桓仁西部地区最大的反动堡垒，有警察白帽队及自卫团、保甲共一百零七人。都是日本侵略者精心豢养的爪牙，胡作非为。傍晚，韩浩指挥部队向二户来方

向挺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双录带队，插入果松川；另一路是解麟阁带队，直奔柳林子。然后，从二户来街两头一齐进攻。更深半夜，二户来警察署大门紧闭，敌人正在沉睡，解麟阁率三团一部及游击连共八十多人越墙而入；李双录率少年连及游击连一部从大门进攻，“小潘中央”①首先打倒门警，然后掏出钥匙将大门打开。解麟阁把兵分成几个队，分别进到各个宿舍；李双录将少年连安排在警察署周围进行警戒，准备围攻。解麟阁闯入正房宿舍，大喊一声。“别动！”，朝天棚打一枪。大家七手八脚把敌人全部拉到炕沿下。曾神气一时的警察狗子，乖乖地缴了械。有几个警官，踢开窗户逃跑，被少年连抓获。战斗不到一小时，胜利结束，打死伪军六十多人，缴获枪上百支，车马计十辆。

民 主 战 士

12月份，伪满民政部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日伪军在抗日武装力量活跃地区的农村，实行野

注①：即抗联一军一师游击连战士潘忠阳绰号。

蛮的集家并屯。随着而来，日本三毛司令亲自指挥辽东地区的冬季“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一师刚刚建立，军需物资常常供不应求。为了迅速打开困难局面，经师司令部研究，调解麟阁任一师参谋。从此解麟阁不但要协助韩浩师长指挥作战，同时，还要帮助军需部长韩震开展地方工作，解决军需物资。一次，他率领九连、十一连以及军需部一分队，包围了庄家油房的日军马驮子，劫获粮油共八百多斤。接着，到洼子沟一带搜山，先后挖出敌人埋藏的子弹三千多粒，枪十余支，消灭日军九人。后来又在梨树沟岭上，劫住敌人马车十余辆。还在查家堡子建立了反日会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支援部队打日本。与此同时，解麟阁还带领警卫连，冒风险、踏冰雪，走访老秃顶山、花脖山、前后夹道子、牛毛大山各个抗联密营，视察军风军纪、检查部队生活学习情况，与各团共议战略战术，把师部和各团之间紧密联结在一起，提高了抗日信心，增强了战斗力。

千 古 英 名

1936年初，解麟阁带领九连、十一连出师二

户来山区黑卧子。他刚到那里，就接待了许多群众，听取群众的呼声和要求。黑卧子抗联地方工作员姜从发、赵志和向解麟阁参谋汇报说，铎尖子警察署长栾仁居的儿子栾五瘸子，在这一带敲竹杠、抢劫人家新娘子。解麟阁十分气愤，当即派人抓来栾五瘸子，并罚款一千元，粮食十石。正在解麟阁处理栾五瘸子的时刻，小恩堡来了个老乡，说解麟阁的爱人生孩子，目前大流血，病情很重，要解麟阁回去看一看。解麟阁虽然心中焦急，但军务在身，不能回家。韩震部长听说了这件事，从军医徐哲那里弄了一付草药，交给解麟阁，劝他把药送回去。解麟阁无奈，安排了一下工作，带领警卫员下山。就在他下山期间，王海峰②叛变逃跑。这个家伙一口气跑到铎尖子警察署，向栾仁居报告，叫栾仁居赶紧救儿子栾五瘸子。栾仁居向二户来警察署署长黄金兰求援。黄金兰又给普乐堡警察署打电话，告知他的侄子黄贵福前去抓解 参 谋。1月21日（农历腊月27日），黄贵福带二十多个

注②：王海峰，铎尖子区人、叛徒，九连战士。

警察兵摸进小恩堡。上午九点多钟，包围了解参
家。解麟阁和警卫员正忙着煎草药，忽然听到外面有
枪声，放下药壶，带领警卫员跑出门口，环视一周，
发现自己被敌人包围了。立即掏出手枪，向敌人射
击，拉着警卫员奋力突围。冲出四百米处，解麟阁腿
部受伤不能行走，只好掩护警卫员冲出包围圈，而自
己身中数弹，光荣牺牲，年仅四十一岁。

杀人不眨眼的黄贵福，惨无人道地割下解麟阁的
头向主子请功领赏。尔后：闯入屋内，将解麟阁爱
人、父亲拉走，一齐交给二户来警察署。解麟阁的头被
毘人挂在二户来街中心的大树上；解麟阁的父亲被活
活烧死。时隔不久，其爱人受尽酷刑后被释放。其
子解吉庆^③指导员，在柳河县喇咕河牺牲。

解麟阁牺牲及其一家的不幸遇难，全师上下，无
不悲痛。韩震部长在二户来黑卧子沟里主持召开追悼
解参谋大会，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消灭日本
侵略者及其反动派，讨还敌人欠下的血债。会议结束

注③：解吉庆，抗联一军一师游击连指导员。

后，韩浩师长、韩震部长带领师部和军需部一分队，到解麟阁家慰问。一周后，韩震部长亲自抓获了叛徒王海峰，把他拉到解麟阁墓前处决，为解麟阁的英灵祭奠。



为国为民 名留山村

——栾学春村长事略

单明生 供稿

“栾村长死的太可惜”，这是原华尖子区降康村村民流传的惋惜话。

栾村长名叫栾学春，1874年出生在凤城县梨树甸子的一个农民家庭里。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寒，念不起书，只好靠打短工糊口。30多岁时给学堂当了三年堂役。近40岁才娶上媳妇。有了老婆孩子后，在原籍难以维持生活，和大哥栾学孔携带家眷，迁到桓仁县华尖子区碑登村趟子沟投奔亲属。在亲朋帮助下，买了20亩山坡地，自己耕种，年吃年用，生活一年比一年渐好。

乡民的好头领

栾学春虽未读书，凭着天资加勤奋却识字很多。他为人正派和善，待人热情，处事公道，社交面广。从沟里到沟外百余户人家，没有不认识他的。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好人，也都和他挺近乎。凭着这样一个人

际关系，在1925年间当上了降康村（现在的碑登和红糖石）村长。在任期间，事事为民着想，每逢灾年，他走亲访友，动员富裕人家开仓施舍，把积囤粮谷分给穷人度命。丰收之年，他按各大户人家的土地亩数，规定出标准，给村上征缴集股粮，以防荒年。栾学春为人清廉，他当村长十多年，集股粮一粒不占，钱款分文不贪，一心为民，不谋私利。他注重乡学，操办筹建一处学堂，聘请有识之士担任教师，教授村民子弟识书达理，宣扬民族文化，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受到乡民的欢迎。

抗联的好帮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桓仁后，栾学春继续担任村长。1934年东北抗日联军开辟桓仁抗日游击根据地，栾村长通过他的好友李向山（抗联一军一师副官）结识了抗联一师军需部部长韩震同志。从此，他秘密的与抗联频繁联系。利用自己公开的村长身份，积极从事抗联的地方工作。在群众中热情地宣传抗联政策主张，热心地为抗联筹集粮响。他四处奔波，动员村民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支援抗联抗日救国，为

抗联多次送米、面、肉、烟、鞋、布、药之类的军需物资。还不远数百里到沈阳城给抗联买回三台缝纫机，去二户来聘请了两名成衣匠，为抗联在老秃顶子、海青火洛等地的被服厂的建立做了人力与物力的准备。他利用自己在村民中的威望，动员青壮年村民参加抗联，打击日寇。并向他们宣传“抗联是中国的军队，是红军，是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你们年轻轻的，别在家受窝囊气，不要当亡国奴……”。在他的动员下，村民霍喜林、阎德魁等有志青年毅然地参加了抗日联军。为抗联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此，栾村长与抗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信任，树立了威望。

乡民的保护人

日本鬼子不仅占据我们的城市，也横行于我们的村庄。为了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断绝抗联的军需来源，实行“集家并屯”的恶毒政策，强迫百姓挖围子。1936年深秋，降康村民每户必须出一名劳力到木孟子挖围子。在那里干活是非常艰苦的，整天吃住在工地。一日只给两顿饭，每顿饭还限量。夜晚睡

在露天地。整天抡着大洋镐刨土，稍一挺腰，警察狗子过来就是一顿皮鞭，百姓叫苦不迭。栾村长听说后，想方设法保护乡民。一日，他邀日本野田指导官，同去检查工程进度。他故意同野田肩并肩地佯装效忠日寇边走边唠，骗得野田的好感。当走到降康村民工地段时，他对野田指导官说：“这是我们降康村民，今后请多多关照”。自此以后，民工们再没有挨打过。

由于日本侵略者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强行集家归屯。从此，抗日联军难以同群众取得联系。他们只能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生活是极端困苦的，常常缺衣少食。春夏秋三季还好对付，一到严冬，别说打鬼子，就连活下去也是极其艰难的。抗联有百姓的同情与支持，有栾学春这样一批地方工作员的艰苦工作，有些接济。而那些小股经济土匪，只好靠抓人质来索要财物。当时叫“绑票”，闹得百姓不得安宁，不管大人或孩子，只要被绑架去，家属就得千方百计地要钱出钱，要物筹物，把亲人赎回。因此，一些百姓被逼得倾家荡产。否则，被绑架去的人就会因此而丧生。降康村民有了栾村长这样一个好头领。百姓们的

人身安全基本是有保证的。

1935——1936年间，降康村的副村长孙庆被绑架了去。栾村长马不停蹄地找到抗联一师副官李向山，以抗联的名义写信警告土匪的办法，将孙庆要了回来。村民李祥仁、吕长江等也先后被绑架去。栾村长又通过抗联李副官的儿子李在野和新宾红庙子黄村长的人际关系给领了回来。村民董世海被“保龙军”抓了去。已决定处死，将埋尸的坑挖好，正准备执行。栾村长急急忙忙，跋山涉水，亲自跑到新宾蒿子沟苦苦哀求，终于把董世海要了回来。1936年秋，村会计高笠清的儿子也被绑去。高笠清要求栾村长从村民中集款赎回他的儿子。栾村长说：“现在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钱，不能这样摊派。我可以找抗联的人，让他们帮忙给你要回来。”高怀疑地问：“能行吗？”栾村长自信地说：“我给红军买布、买机器，提供各种给养，这点事是不费难的。”没过几日，也托李向山给要了回来。栾村长就这样搅尽脑汁冒着生命危险为村民东奔西跑，保护村民的人身安全。博得了村民的爱戴，都视栾村长为好人、恩人。

他不该这样离去

栾学春这样一个好村长，多年来的为人行事博得了群众的爱戴。但也遭到了不尽情义的少数坏人的暗算。本村会计高笠清就是这样一个有恩不报，以怨报德的小人。

高笠清是一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见利忘义的人，是本村有名的大烟鬼。染上这种恶习以后，家境败光，只能靠爹妈给灌的那几滴墨水子维持生活。为买烟泡、过烟瘾，常常为别人打官司告状，写“黑呈子”赚钱。为此，百姓称他为“刀笔邪神”。他一犯烟瘾，就什么屁眼都拉，不择手段，不计廉耻地四处弄钱。对此，栾村长曾多次批评他。打从他掌握了栾村长同抗联有联系的秘密以后，不记前恩，反生邪念。为在敌伪势力面前捞一笔不义之财，好过烟瘾。便写了“黑呈子”密告到新宾警察署。不久，新宾警察署将栾村长捕了去。栾村长的家属亲友出钱疏通，把栾村长赎了回来。这个大烟鬼，没有捞到油水，便一不做二不休，又暗自告到桓仁日本守备队。说栾学春如何私通抗联，给抗联送粮买缝纫机等一些具体事实。

因此，1937年春节后，栾村长被捕到桓仁县城。日本侵略军不问青红皂白，于是年正月十五，将栾村长押送到西江沿，用刺刀刺死，还残忍地将其心掏出来。

栾学春惨遭杀害。在桓仁城居住的郭殿才（栾学春亲属）连夜急奔栾家送信。次日凌晨买了一口薄皮棺材运回到降康村。村民们对栾村长的死无不感到震惊、愤怒、悲痛、惋惜。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村民们只能以暗暗流泪，背地痛骂杀人的刽子手的方式来追悼。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家乡村民在1946年反清算运动中，检举揭发了汉奸高笠清的罪行。是年五月，人民政府处决了高笠清。终于为人民的好村长，报了仇、雪了恨。自此，山乡人民一直传颂着栾学春为国为民的事迹。距今，虽已年过半个世纪，人民的好村长、抗联的好后勤栾学春的名字，仍深深地铭刻在广大山乡村民的心田。

马 家 父 子

孙长礼 崔忠善 供稿

马富是桓仁县有名的能工巧匠，头脑聪颖，才思敏捷，好钻研，喜创新。他的四个儿子（长子马贵清、次子马贵春、三子马贵敏、四子马贵精），由于受他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亦是个个聪明，才智出众，不论是栽培果树、饲养畜禽或研制机械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桓仁县最早用水动力带动的磨，是马富发明创建的。并帮助泡子沿德兴泉等烧锅修建起水动力磨。

桓仁县最早的一台自行车，是马富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安东（今丹东市）买的。法国产品，钢架，木圈，胶皮内、外胎，无闸，无飞轮。在骑车回家途中，车胎瘪了，只好扛车回家。到家后，自己用土法做了一个气管子，打上气照常骑用。后来借给别人骑用时，撞坏了前圈，不能使用。经马富反复琢磨，用大铁锅烧水，在木制锅盖上开一个圆孔，安上薄铁炉筒，将桦木楞置入筒内，待水蒸气将桦木楞

燻蒸变软后，将桦木楞围在石磨上，将先做好的榫头使上水胶插接好，便制成了车圈，与原有车圈完全相同，照常骑用。

桓仁镇最早的果园，是马富于民国四年（1915年）创建的。先是在镇小北岭北山头建起梨树园，有梨树500多棵。后于民国七年（1918年），在小北岭前山建起了山楂园，栽接山楂树2000多棵。

桓仁镇最早的撩壕，是马富于民国四年（1915年），为搞好水土保持，在桓仁小北岭两侧山坡上修建的，全长5000多延长米，平均壕宽1米多，最长的一条有3000米。不但保持了水土，而且在夏秋季还可供人们洗澡洗衣服。伪满洲国《农业进步》杂志报道了他所修的撩壕，并附有照片。

马富善施好舍，接济贫困，支助衣食钱物，修桥补路，舍出义地等事不胜枚举。如桓仁镇三道街的石拱桥（罗锅桥），就是马富自行设计和投资修建的；由桓仁镇西门脸至小北岭的路，原只能走一排马车，

凸凹不平，洼子多而深。是他出资雇用130多个人工，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拓宽取直填平的；由小北岭至现在县第一中学校址一溜山脚的三处义地（乱坟岗子），是他无赏舍出来的。

马贵清，生于宣统元年（1909年），现年81岁，于桓仁镇南关高级小学校毕业后，在家务农。

桓仁的大白桃、兴津油桃、六月鲜桃，是马贵清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从日本国东京兴农园、爱知县津掇赖光园最先引进的。共买苗木20多棵，苗木是用青苔白纸和白花旗布包装的，经轮船、火车、汽车共28天时间才运到桓仁，但苗木已经干枯。其父见此情景，将桃苗弃之于地上。马贵清并不灰心，将苗木用水泡过，用细砂栽在花盆里，放到菜窖里，经过细心培养，救活了两棵六月鲜、两棵大白桃、三棵兴津油桃。特别是大白桃，二年就见果，此果个大（大的半斤多），早结早熟，形美皮薄，肉厚味甜水份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他从东京兴农园及北海道大和园引进蕃茄种子，开始在桓仁生产。

桓仁的四季草莓和大草莓也是他引进的。

现在桓仁的赤玉葡萄，是他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从日本东京兴农园引进的。特点是味甜适口，而且高产，一穗重达1~2市斤。

马贵清在桓仁镇西关第九生产队当果树技术员时，于1960年从延吉市果园引进了苹果梨。同时引进了朝鲜洋梨。又从兴城果树科研所引进了早酥梨和锦丰梨。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他从日本皇国兴农园购买一对扎念奶山羊，经通化运到桓仁。同时购进安格拉长毛兔8只，是经沈阳南站运到桓仁县城的。

他在桓仁镇西关建立了桓仁县最大的集体果园，共有四个园子，大多数是苹果梨，其次是锦丰梨、早酥梨和身不知梨，还有少量的苹果。

1950年他从旅顺带回红瓦样品（建房用瓦），开始仿制，裂口翘头。后经研究，在瓦坯阳半干时，下架阴干，不裂不翘，从此批量生产。

桓仁的甘兰（又名大头菜），是他于民国二十五

年（1936年）从日本引进的。还有“长茄子”，有酒盅粗，二尺半长；美国大茄子，有现在的罐头瓶子大；“大辣椒”有茶碗大小；“佛手辣椒”，向上长，一撮有六、七个尖椒，并且最辣；“洋黄瓜”，刺大沟深，二尺多长。

马贵清还为桓仁引进了不少的粮食作物新品种。如“农林三号小麦”，特点是穗长质优，棵矮不倒伏；“大八行苞米”，粒大、色黄；“春荞麦”、“甜苞米”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他从日本购买“来航鸡”混合雏200只，种蛋500个。去旅顺“农业进步社”取雏蛋时，雇用一名孵雏技术员，回县孵化成功。自办一处养鸡场——昆松养鸡场。

为了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引进新品种，他曾自费去过朝鲜、延吉、山东、河北及我省辽南各 地 区。

马贵清对各种果树的栽培、嫁接管理等农艺方面的技术高超，精湛娴熟，县内居首位，省外有名。且从不保守，乐于助人，有求必应，耐心传授。县里召开果树技术会议时，先请他给讲课，不仅为本县各地解

决不易解决的问题，而且热情地帮助外地解决技术上的疑难问题。如抚顺市请他去给传授技术，有90多人向他学习果树管理技术。抚顺地区冬季对桃树不敢埋，一埋就折，冻死许多。马贵清去后，当场示范，挖2尺见方，1.5米深的坑，将桃树按倒、培土埋上，并讲明了科学道理。

本溪县草河口大队请马贵清去给讲果树技术课，解决了桃树冬季不埋冻坏芽苞的难题。

1965年长春市来桓仁镇20多人，特请马贵清给讲葡萄栽培法，后又三次被请去长春讲果树栽培等技术。

1966年吉林省通化市农业局派20多人，向他学习果树栽培技术。

1968年本溪市农业局派来80多人，向他学习果树栽培技术。致于零星少数人前来向他学习领教的更是不胜枚举。

次子马贵春，生于1915年，现年75岁，初级小学毕业后，随其父在水磨房干活，对各种机械非常感兴趣，经常琢磨机械的原理和作用。伪满洲国实

行粮谷统配制，不准私人加工粮谷、豆油，无奈他家的水磨改成了拉香面子、压棉花。以后他又在家培育各种果树苗和种植蔬菜。

1951年，他自行研制成小型脚踏式脱谷机和水田犁；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化后，他当上了西关大队蔬菜技术员，建起了温室，春育苗、冬栽芹菜、韭菜、蒜苗；1958年在桓仁镇公社机械厂机械车间当工长，他毫不保守地向青年徒工传授车、钳、铆、锻、焊技术。他研制生产出水田除草机、播种机、刨垅机、铲趟机、喷灌机（五个喷头，每个喷头可喷出40米远）。后在大队机械厂厂长带领下，同另外两名木工一起到沈阳北站工具厂参观学习两个小时，回县后，仅凭他个人记忆，制成了镐把机。曾销往通化三岔子、赤峰等地。

1965年在西关大队机械厂又研制成七马力，长2.3米，宽800公分，高1.4米的大型电力脱谷机，8小时能脱谷两万斤。除苞米外，水稻、小麦、豆子均可使用，脱粒、打乱草、扬场可连续作业一次完成。被县工业局鉴定批准批量生产，由县农

资公司进行推销。

1972年全国铁路系统和土产部门，在吉林省城召开“打包机”会议，规定运输烟草、破布必须用打包机打包，否则不予运输。同时进行打包机订货。当时桓仁镇公社机械厂送去马贵春所制造的卧式、立式打包机各一台，倍受与会者欣赏，不但畅销辽宁省内各地，并且远销到广西。

马贵春去北票县参观梳毛机，回县后仿制了一台梳毛机，超越原机，能除却绒毛和尘土杂质。他为盘锦研制镰刀把机四台，不要任何报酬。

马贵春同他大哥马贵清的德才相同，秉性无异，忠厚正直，从不贪图公家和他人的便宜，且勤劳肯干。他在桓仁镇农机厂时曾获得县劳动模范称号，近年又获得县劳动者协会和县工商管理局联名发给的先进生产者奖励和奖状。

三子马贵敏，现年71岁，初中毕业后，在家种菜，栽植葡萄。于1947年5月去辽源造轧花机齿，在机械研制方面颇有成效。于1956年任辽源毛皮刀具厂车间主任，现退休。

四子马贵精，现年62岁，初中毕业后在家种菜，后又在家修理、制做农机具，他自幼喜爱机械，在八岁那年便会拆装自行车。后于1949年去沈阳铜厂学徒。一次该厂从南方借用一台机器，全厂数十人试着安装，经十多天时间，始终安装不上。后来厂长责成他一人安装，他胸有成竹、沉着冷静，在短时间内将机器安装完毕，试车成功，博得众人喝彩，全厂赞佩。

马家父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借鉴则又较少，在这偏僻的山区，竟然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实值颂扬。这是马家父子的荣耀，也为我县增添了光彩，将给后人以启迪和鼓舞，激励着人们去奋进。

程斌叛变前后

李 戎 供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广大民众和爱国志士不畏强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助之下，先后组建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他们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克服了重重困难和挫折，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驰骋于东北各地，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

然而，在这历史转变关头，部分意志薄弱者，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在强大敌人面前，屈膝投降，叛变革命，成为民族败类。程斌就是其中的一个。

程斌，曾用名程捷、程杰、程志平、程子平。祖籍山西祁县，1912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城。

1929年毕业于长春自强中学，1930年在长春大恒钟表店当工人。1932年5月参加磐石工农抗日义勇军，任队长，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政委。1934年春曾率部随杨靖宇挺进桓仁县

仙人洞山区。尔后，以老秃顶子为中心建立多处密营。8月程斌任一师政治部主任，指挥部队在阎王鼻子消灭一股日伪军。从此，在桓仁地区和邻县宽甸、本溪一带，开辟了桓仁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5年4月，程斌率部从桓仁窟窿榆树出发，奔袭赛马集，消灭了二百余人的日伪武装，缴获枪支弹药千余件，取得战斗胜利。5月，程斌部三、四百人，从宽甸天桥沟开赴高俭地，途中消灭日军七人，俘虏伪军七十人，缴获武器七十多件。7月，一师从桓仁东部向西部转移，途经沙尖子、二棚甸子、马圈子、二户来，8月初抵达华尖子。在横道河子消灭日伪军五十多人，缴获马匹、枪支和各种军用物资，又一次取得战斗胜利。1935年8月，程斌任一师师长兼师党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卫队，组建四团，并联合各个抗日军一同作战，巩固及扩大了桓仁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6年4月，程斌率一师在抗联一军军长杨靖宇亲自指挥下，在凤城梨树甸子击溃邵本良伪军八百人队伍，轰动南满各地。6月28日又率三百人

从宽甸蒲石河出发，举行抗联史上第一次西征，取得“摩天岭大捷”。1937年10月又在宽甸双山子消灭大批敌人，击毙日本少佐水出佐吉，使日本侵略军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可是，由于战斗的接连胜利，程斌滋长起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的情绪，在艰苦的战争考验面前，革命意志开始动摇。

1938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调集松岩、福本、米冈、石津等大批主力，在黑崎游击队、长岛工作班配合下，采取经济封锁、军事压力、政治诱降全面措施，向老和尚帽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疯狂进攻。敌人在运用武力挟迫一师部队的同时，还直接派遣汉奸特务及叛徒对程斌进行政治诱降。

6月间，叛徒安光勋（原抗联一军参谋长）、胡国臣（原抗联一师政治部主任）向敌人献计说：

“程斌对母亲很孝顺，皇军可以秘密逮捕他的母亲作人质，以逼程斌归顺”。桓仁的日本指导官赖户和通化日本宪兵队长长岛玉次郎根据他们的提议，派出特务沈亚东探知程斌家庭住址。然后派沙山伍长和胡国

臣等人前往吉林省伊通县城东门外，逮捕了程斌母亲张氏；接着，又到公主岭逮捕了程斌哥哥程恩，并押至本溪碱厂。

程斌在从宽甸返回老和尚帽子密营途中，看见日军散发传单，得知母亲和哥哥被捕的消息，心里焦急，情绪悲观。6月27日当一师在向黄柏峪方向行军的途中，程斌召集三团政委李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开会，试探二李对投降的态度。当即遭到二李的反对。程斌乘李茨苏不备，将他打死。然后又向李向前开枪，未中，李向前带伤脱险。傍晚，机枪连连长甄旭光借搞给养时机，携枪逃跑，向长岛工作班报告程斌的动向。

6月29日，程斌在双岔头召集班长以上干部会议，公然暴露出叛徒的可耻嘴脸。他说：“我们没希望了，我要领着你们投降去”，并说：“自古忠孝不能双全，我母亲和哥哥都被日本人抓去，我不投降，他们就活不了……”。这时，日军派韩永和带着程恩前来劝降。程恩见程斌后就问：“你要不要母亲？……”程斌不知羞耻地说：“不革命也得要母亲！”——

语道破了他自己的动摇企图。与此同时，敌人还派密探给程斌送去叛徒安光勋和胡国臣的劝降信。在敌人的一系列诱降面前，程斌置党和民族利益而不顾，应允了敌人的一切要求，带领六十人下山投降。晚八时，程斌到本溪八楞树村，向长岛工作班缴械。在程斌的唆使下，六团三十三人也到八楞树投敌。7月1日，程斌又派保安连长何贵有找军需部三分队，三分队二十一人也相继投降。由于叛徒程斌胁迫部下投降，一师总共投敌人数达一百一十五人，拱手缴出平射炮一门，炮弹三十多发，轻机枪五挺、步枪八十四支、手枪七十二支，子弹六千二百余发。3月31日上午，黑崎大尉、长岛玉次郎及日满各机关代表检点了程斌叛匪队伍。并且在本溪县碱厂附近的本溪湖小学为程斌一伙叛徒举行所谓“归顺”仪式。由于这一事件严重影响，导致抗联一军一师以及结盟的义勇军几乎全部解体溃散。

1938年10月，程斌被伪通化省警务厅任命为富森警察大队副队长。带领富森大队开始破坏抗联在桓、宽地区开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中所有医院、修

械所、被服厂和粮食、武器弹药等储备点，使抗联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抗联一军不得不放弃桓仁地区革命根据地，开始向北转移。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牺牲。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将程斌调到濛江县城，经程斌辨认牺牲者就是杨靖宇。残无人道的敌人割下了杨靖宇的头颅。接着，程斌又带“讨伐”大队进攻牡丹江一带，进行“讨伐”抗联的罪恶活动。

1941年8月，程斌大队被调至热河省增援日军扫荡，配合日军在安匠屯一带“集家并屯”，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1942年程斌升任为热河省警察大队警政大队长后，带三个中队封锁驻鹰首营子一带八路军，在松树峪、将军关、王平石、下营房、兴城镇等边区进行大扫荡，残杀群众，围攻抗日部队。

1945年全国抗战取得伟大胜利后，程斌又投靠了国民党军队，被编为东北行辕直属第三纵队任副总司令，驻守遵化县城。程斌令其部下拆房扒庙，修筑工事，同八路军顽抗。不久遵化县城解放，程斌逃

到唐山。程匪被国民党七十一军任命为第六师上校副师长，侵占彰武、新民等解放区。1946年6月，程斌带国民党部队一千七百人侵占法库县城，杀害和俘虏我方工作人员三十余名，当即提升为少将副师长。1948年2月，程斌任蒋53军高级参谋。11月沈阳解放，程斌带母亲、妻子和两个儿子乘飞机逃往北平匿居。解放后，程斌隐瞒历史罪恶，混入我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二处当科员。

1951年4月28日，程斌在北京东单牌楼胡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归案。经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于5月12日押至承德市处决。

大刀会司令王东山

张凤浦 供稿

大刀会是清末的一种民间秘密团体。开始，主要在山东省登州、莱阳、即墨一带秘密流传，舞刀弄棒，信神练功。大刀会被人们传得玄而又玄，神而又神，说大刀会的人胆子大，不怵硬，不怕死，气功练得好，刀枪不入。表面上，他们是锻炼身体，保家自卫；实际上是继承义和团反清灭洋的传统，杀富济贫，打抱不平。参加者大多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失业劳动者和游民。

王东山原来是一个织布的机匠，后来参加了大刀会。他中上等个头，身体魁梧，四方大脸，眼睛分外有神，声音宏亮，能说会讲，在大刀会里也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头头。

那时，旧军阀张中昌督办镇守山东，军部驻在济南，他们称大刀会为“胡匪”，经常带兵剿“匪”。虽然传说大刀会员是刀枪不入，但也抗不了枪子打。这样，大刀会就由山东被撵到关内外其他省份。

一九二六年，大刀会老师梅吉玉、张中生带领部分大刀会员来到临江的红土崖、六道沟一带落户。红土崖这个地方山高林密，是一个六、七十华里长的一个大沟筒子，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梅吉玉、张中生又操办起大刀会来，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我东北，奴役我同胞。东北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日队伍进行抗日救国。一九三二年唐聚五在桓仁县举起义旗，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这时，王东山也组织起大刀会的白旗会，他担任司令同时又是老师，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深受群众欢迎。后由辽宁民众自卫军十一路司令梁锡福介绍，王东山率领大刀会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在唐聚五部下编为十三支队，王东山任司令，驻防在宽甸县牛毛坞。

一九三二年农历五月，大汉奸于芷山纠集了两个营的兵力和一部分地方武装攻打牛毛坞。唐聚五组织第七路、第五路和十三支队的兵力，两次迎战牛毛坞。取得胜利后，唐聚五令十三支队撤往桓仁与宽甸

交界的砍椽岭防守。这时，将王东山部撤到桓仁县普乐堡“源兴永”烧锅大院驻防。

普乐堡管辖内干沟子的城头甸子有一个称做“马家大窝棚”的大户，全家一百另三口人。户主马成功，外号马四爷，是桓仁南路有名的绅士。“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马四爷看形势不妙便把家分开了。马四爷的儿子马忠亮，年轻力壮，精明强干，在自家前屋出了一个小床子（经销店）维持生活。马忠亮的媳妇是桓仁县城里张四疯子的外甥女春英子，这年才二十二岁，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

王东山手下有一个副官叫鞠元龙，这小子一肚子坏道儿，跟着王东山狐假虎威不干好事。他以官诈财，经常到马忠亮小床子拿烟卷不给钱。王东山住在烧锅大院里，从普乐堡往下到大雅河口，都住着王东山的兵。王东山经常到各村屯察看情况，每逢路过干沟子便到马忠亮家吃吃喝喝，酒足饭饱之后再过过大烟瘾。王东山躺在炕上抽大烟时，就找马忠亮的漂亮媳妇春英子给烧大烟泡。因为王东山是司令，得罪不起，春英子也只得应酬。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两个人便勾

搭成奸了。

本来，鞠元龙抽烟卷不给钱，马忠亮就十分恼怒；现在王东山又把娇妻霸占了去，仇火就更大了。一天，马忠亮不让春英子给王东山烧烟泡，与王东山争吵起来。王东山把马忠亮带到普乐堡烧锅大院，一阵毒打之后，又把他拽到烧锅门外一百米处的“裕兴魁”杂货商店门前一个小桥边，挥起大刀砍掉了马忠亮的脑袋。王东山还扬言要把马家大窝棚给平了，吓得马家老小跑到前山坟莹地的大树林子里躲藏起来。

马四爷见儿子被王东山杀害了，悲愤交加，决心找唐聚五告状。他走了两天来到通化县自卫军总司令部，见到唐聚五总司令就跪下了。唐聚五赶忙弯腰把马四爷扶起，让坐斟茶，详细听马四爷诉说儿子马忠亮的遭遇。第二天，唐聚五派马队分队长于振山带领二十几名骑兵到普乐堡干沟子调查了情况。干沟子群众议论纷纷，争相揭露王东山的罪行。

就在这个时候，救国会派四名女同志到桓仁慰问自卫军官兵。桓仁县又选出几位女学生与救国会的女同志一起到普乐堡慰问。王东山见来的都是年轻漂亮

的女人，色胆顿时膨胀起来，开始寒暄几句之后，便嘻皮笑脸的不说正经的啦。天黑的时候，硬把慰问团最漂亮的马淑英留在身边，恣意寻欢作乐。其他女同志怕失身受辱，连宿搭夜往县城返，走到南边石哈达天就快亮了。她们过了江找到警备司令文禄说明了情况。文禄派两个兵骑马去普乐堡把马淑英接回县城，又送往通化救国会。

唐聚五举旗之初就主持制定了军纪二十一条，令全军遵照执行。对破坏军纪者，一律严惩不贷。唐聚五根据调查来的情况，给王东山列了四条罪状：

（一）杀害无辜，（二）奸污妇女，（三）克扣兵饷，（四）私改军衔。

于是，唐聚五于农历七月中旬带领马队由通化来到桓仁，通知王东山进城开会。王东山带了一个连的兵来到县城，住在“怡庆德”大杂货商店的后屋，门前放了四个岗哨，随身跟了四个通讯员。俗话说：

“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王东山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心虚胆颤。

唐聚五见到王东山就问：“嗨！你怎么也佩带中

将军衔啦？”唐聚五见王东山缄口不答，便接着说：

“没委任你为中将，就不要戴那个中将衔了。”唐聚五又和颜悦色地说：“听说你把马忠亮杀了，影响不好。你不能在普乐堡驻防了。我想把你换到别的地方驻防，你看怎样？”王东山仍是不言语。唐聚五又说：“你知道文禄派骑兵把马淑英接回救国会的事吗？”王东山以往的威风没有了，勉强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知道”。

“你抽大烟的钱是从哪弄来的？”

“……”

唐聚五虽然没发态度，象是与王东山唠家常，但王东山感到字字千钧。对唐聚五这位总司令，他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在唐聚五面前，他下意识地拆掉了他自己佩戴的中将军衔。

会议当天就散了。王东山想唐总司令没有难为他，心里的那块石头落了地，心情也安静多了，回到驻地一觉睡到大天亮。他翻过身来一摸，手枪不在了。这时，他的两个通讯员冲进屋来，枪口对着他，上前将他绑了。他的老婆在被窝里吓得嗷嗷叫。

上午十点钟左右，王东山被送到县城唐聚五的住处。王东山知道大事不妙，连说：“哎呀我的娘呀，再也看不到我的娘啦！”。

唐聚五早有准备，他在县城木匠铺订了一口黄花松的“二三四”的花头棺材。是曲江兰连宿搭夜给画的。文禄对唐聚五说：“这样的败类，喂狗得啦！”唐聚五总司令含着眼泪说：“不能，不能那样。不管怎样，王东山打过日本鬼子还算有功，功过要分开……”。

中午时分，王东山被拉到县城西关隋家街的二股流处，宣布罪状，验明证身，枪决了。

桓仁反袁独立及其失败

陈 长 河 供 稿

一、宣告独立

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不久，1916年4月底，桓仁县知事（监督）王济辉联合革命党人邵兆中等，组成以邵为司令王本人为副司令的辽东讨袁护国军，并发表声讨袁世凯檄文，宣布反袁独立。

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准备，4月28日早8时，王济辉率“前次抽调驻扎县属游击队及司法警察”共四十余人，组成护国军，并“捣毁电局机匣（电机）”①，切断交通联系，然后出示悬旗（旗上书“总司令部”字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②，宣告反袁独立。独立后，因其他军警不肯附义，王深感力量单薄，不得已而率众携款，“弃城南遁”③，决心进一步积聚力量，在辽东各县与袁世凯及其在奉天的代理人周旋到底。

王济辉率众起义的经过，署理兴京县知事邹健鹏4月30日致奉天盛武将军张作霖禀中，有较详记述：

“……本日知事复将桓仁县警察所长王澄华派来兴京拍发电报之巡长于占海招之县署，查询详细情形。据该巡长面称：王知事于四月二十八日前几日，曾通令四乡警区区官及团总，各将所部警团，全数带到县城，听候拣选游击队。至二十七日，警团齐集县城，当经王知事在于各乡警察团丁内专就非桓籍之人拣选各二十名，又司法队数人为游击队，委令亲信人管带。并束请防营杨管带、县佐李邦藩、警察所长王澄华及各区官、团总于二十八日午前八时在县宴会，并约十点钟同看游击队演枪打靶。名虽如此，实则商议独立之事。詎是日未届宴会钟点，而王知事宣扬独立之风，业已传播街市。王所长闻知前情，当即商同各区官、团总，均藉词未赴宴会。一面知会杨管带派人至署，回辞王知事，并诬称通化现有匪警，今日必有防军入桓城接应等语。维时王知事因见警团均无响应希望，且防军尚须添来桓城，一时情

急，当即悬挂白旗，文曰：‘宣告独立，保护商民’。并胁迫自拣游击队兵，前往电报局砸毁机器。王所长当拟开枪攻击，商界恐波及城内人民，要求阻止，王知事即带同自拣游击队渡过江南逃去。王所长、李县佐一面保护封狱，维持秩序，并派队追赶。”④

宣布独立后，起义军与反动军警双方，应绅商等要求，为免得城中遭到损失，均未互相开火。及至王济辉出城后，警长王澄华始一面督警尾追，一面派警护守监狱，维持秩序。

王济辉出走后，桓仁行政无人主持。先是，桓仁四平街县佐李邦藩于4月25日奉济辉函调来城，“面商要公”。28日早，李赴县署晤王，王当即“声言公出”，委李代理县务。⑤及至起义爆发，奉天盛武将军行署曾令派通化县知事潘德荃前来桓仁，会同军警维持秩序，并等候派员接理，而通化县事务则暂由该知事派人代行。29日，李邦藩又电请张作霖“速派委员前来接办”⑥。李旋即奉令代理，并于5月1日正式视事。

二、追击堵截

王济辉独立出走后，奉天军政当局张作霖等既怕又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下令东边及桓城各军政官员进行追堵，不使“漏网”。4月29日，奉天盛武将军行署电令东边镇守使马龙潭、东边道尹方大英：“仰即会同督飭军警一体严拿，必有重赏”⑦。马、方当即遵令分别函电各属督同军警“严拿”，并于安东部署“截缉”。30日，该将军行署又电令驻桓城管带杨某、代理知事李邦藩及警察所长王澄华，对于起义军应“查明严办”。其电云：“逃员王济辉所带附乱兵警，当不乏本乡之人，乃竟甘附乱，背弃乡井，殊堪痛恨！仰即会同查明严办，以警将来。”⑦同日，该行署还电令安东水警长黄庆阶“协缉”，谓“桓县王令潜逃，已飭严拿。仰即督警协缉，勿任漏网，捕得时必有重赏。”⑧王济辉率众离城后，管带杨某曾问道赴东路浑江下游地方堵击，无奈“因彼舟我陆，以致未能追获”⑨。杨也因此获谴，奉电撤差。

同时，盛武将军行署派团长张景惠前往桓城坐镇，并令有关各处“协缉”。后张又被派往长甸沿江地

区主持“防剿”军事。

辑安县与桓仁县为邻。桓仁独立，辑安震动。辑安县知事高某于获悉桓仁独立后，即于4月30日电请张作霖派兵来辑协防。声称：“辑境西北与桓为界，系咽喉居中之地，东道最为紧要”。因之，悬请“酌派妥靠军队，来辑驻扎”⑩。张当即复电，要该县“亟宜镇定，勿自纷扰”⑪。

三、交涉引渡

王济辉率义军出城后，即沿浑江南下转入鸭绿江。由于沿途群众纷纷加入，义军队伍急增至一百余人。敌人深怕义军开往安东，与当地党人合作大举，后果堪虞，乃赶忙布置镇压措施。4月30日，马龙潭自凤凰城致电张作霖称：“该逃令既已过江，度必赴新义州、大连等处勾结乱党，希图再举，安东防务倍形吃紧。潭拟俟布置妥协，即赴安会同道尹督飭严防”⑫。同日稍后，马又电张，报告其所拟“防剿”办法：“查桓境隔韩岸百余里，（王济辉）所带临时招募乌合百余，均非善类，并恐韩岸党匪过江接应，致危大局，已电飭刘管带督队，由水路星赴没尖、辉江

口（编者按：“没尖”，当是沙尖子、“辉江口”当是浑江口之误）一带堵击，并防韩岸党匪接应。一面分飭步四、六两营，由通、宽两路袭击；一面派傅管带同张国光驰往督剿，务期一举荡平，以维大局。并请电飭各该县警团协同堵拿，悉听傅管带、张国光调遣为叩”⑬。

起义军由浑江转入鸭江，顺流而下。5月1日，据鸭浑两江水上警察厅探报，义军百余人，由王济辉率领，乘坐江船三只，停泊于韩界碧果洞。旋又转至碧瞳、仓城（编者按：“仓城”疑是“昌城”之误）等处驻扎。2日，马龙潭亲往安东与方大英会商，因虑义军地处韩境，“非我国权限所能剿捕”，故拟借王济辉“盗款潜逃”为名，照请日领知会韩警将其逮捕引渡。同日，奉天巡按使复电复马龙潭、方大英，称赞交涉引渡，“办法甚是”，并令将王济辉、邵兆中“设法弋获”⑭，以绝后患。

四、结束战斗

从5月2日起至5日止，义军在宽甸境内蒲石河、长甸河口等地，与反动军警打了几场颇为出色的

硬仗。5月2日，在王济辉、邵兆中的指挥下，义军突攻蒲石河，与当地警团展开激战。义军奋勇直前，连破数卡，迫使警团就范，解除武装，商民也纷纷悬挂白旗表示归顺。义军大获全胜。据称：义军“将该处巡警大炮十九杆、水警大枪八杆，以及保卫团枪械十余杆，被匪连长徐麟阁、指挥官韩某、佟某带队六十余人全数劫去，并将水警杨署长绑缚过江后，不知如何逃回”⑮。

义军在蒲石河获胜后，又继续乘船顺流下驶，在永甸河口等处的对岸停留。5月4日夜间，义军分为三路过岸进攻长甸河口，与驻该处之防军，自凌晨至十二时在长甸迤上王八脖子等地进行战斗。义军英勇作战，敌人也承认“匪势凶猛，攻打甚急”⑯。当时敌方“何区官（何俊彦）、王巡官占附近山岗要隘堵击苏甸，长甸两路匪党，董哨官、樊巡官在江沿及东岗两处堵击。”⑰战斗结果，据称“防军、逆匪，互有伤亡。嗣后防军失利，色哨长不知下落。”⑱。又称“毙匪党二名，伤五名，巡警王得胜受伤”⑲。当日晚，义军即退回老台沟，驻扎距长甸二十余里的大江

口，休整待命。

义军在长甸作战后，为环境及形势所迫，退入安东日本租借地内，旋即被日本兵解除武装。原来，反动当局预先与驻韩日本宪兵交涉，提出要求，如有义军过境，应派“日兵勒卸枪械”。6日早六时，日本宪兵部派人报告，声称“已将党匪枪械留下，匪枪七、八棵，大枪六十余棵”②。护国军终于在中外合谋下被解除了武装。

辽东护国军甫告失败，张作霖新派的桓仁县知事戴瑞珍，即于5月7日至桓城正式视事。

桓仁县在近代史上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仅袁世凯统治时期，在王济辉宣布独立率众起义之前，即有1915年5至7月革命党人赵德山率部攻占桓城事件。是年5月27日，赵率部进据桓城，旋以众寡不敌，受挫退出。7月29日，赵又重新组织力量，再次进攻桓城，由于同样原因，仍以失败而告终②。而本文所述王、邵领导的护国军则是一次略具规模并驰骋于东边数县的讨袁护国起义，与袁的徒子徒孙作了英勇斗争。这一斗争，后来虽为反动派所镇压，但在

桓城近代史上却无疑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

①桓仁县警长王澄华1916年4月29日致张作霖等电；《奉天省公署档案》。

②⑨桓仁县各界代表张化新等1916年5月6日致张作霖冯德麟等电；《奉天省公署档案》。

③通化县知事潘德荃1916年4月29日致张作霖密电；《奉天省公署档案》。

④⑥-⑧⑩-⑭《奉天省公署档案》。

⑤详见李邦藩1916年4月26日致张作霖电；《奉天省公署档案》。

⑮⑱安东警察厅长高云昆1916年5月6日致张作霖禀；《奉天省公署档案》。

⑯⑳宽甸县知事张纯熙1916年5月7日致张作霖快邮代电；《奉天省公署档案》。

⑰⑲张纯熙1916年5月6日致张作霖快邮代电；《奉天省公署档案》。

㉑民国19年版《桓仁县志》记载，民国4年，夏历五月二十七日，栾六率300余人攻占桓仁县

城在,县城停留了三昼夜。编者按:是年夏历五月二十七日,正是公历7月9日。按时间推算,与陈长河所撰《兰六攻占桓城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兰六联合革命党人于1915年7月9日攻占桓仁县城一事相吻合。因此,应该认为,此处所记革命党人赵德山1915年5月27日率部进据桓仁县城的时间,不是公历,而是夏历,与兰六夏历五月二十七日攻占桓仁县城,两者同属一事。另外,文中所记,7月29日赵德山又重新组织力量进攻桓城一事,旧《桓仁县志》无记载。

蓝六攻占桓仁城的前前后后

陈 长 河 供 稿

民国初年，即1912年至1915年袁世凯当政时期，由蓝六、柴树发、黄四、懒五等率领的活动于辽东桓仁、宽甸、本溪、通化等七县的所谓“积年巨匪”，是一支受到革命党人支持的专门与反动官府作对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人民反抗武装。奉天将军兼巡按使段芝贵1915年11月6日致北京统率办事处的密电说：“窃照奉天有积年巨匪蓝六，肆扰桓仁、宽甸、本溪等七县，复投身乱党，伪号大都督，三载于兹，终难擒获。”①这一反抗斗争事件，在辽东地区曾产生了一定影响。

蓝六（《桓仁县志》称栾六），桓仁县红塘石人。“因被官府勒迫，穷促无告”而为“匪”者。据民国19年版《桓仁县志》记载，民国元、二年之间，常活动于桓仁县恩堡、牛毛、土门岭，拉古甲一线，曾一度为桓仁县官府所“擒获”，关押在监狱之中，被同党营救而越狱。1914年9月8日，他

们联合革命党人，攻克本溪县城，占领警署，释放囚犯，旋遭反动军队镇压而失败。同年11月27日，他们又聚众二百余人，计划再次进袭本溪县城，与马龙潭部发生激战，颇有伤亡，蓝六等幸免于难。

1915年5、6月间，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在一次战斗中，柴树发及其部下多名不幸“被击毙”，壮烈牺牲。

柴树发牺牲后，由黄四、懒五率领残存武装，与蓝六“分帮各窜”②，化整为零，继续坚持与地方官府作斗争。

蓝六与黄四、懒五分手后，即率部下二百余人，南下宽甸，开进小石湖附近山岗。敌人跟踪追击，毫不放松，立足未稳，双方又在丛林中发生了战斗。经过长达六小时的交锋，蓝六所部依凭丛林掩护，神出鬼没，故伤亡甚小，仅“毙匪三名，伤五名，……获骡马二头，兵马阵毙二匹”③，以及夺去“人票”袁锡恩、李本宽二名而已。后因天黑雨急，战斗遂告停止。当日夜里，蓝六又率部转移，伺机再起。

6月24日，蓝六率部进袭桓仁县南区夹道子、

西区大恩堡一带。当地反动警团奉命起而阻击，蓝部不敌，乃退往二户来、华尖子等处。敌人所调陆防军又先后赶到，并兵分两路，进行包抄。蓝部据险抵抗，激战三小时，终以力不能支，被迫放弃山岗两处，且战且退，撤至兴京县上青沟。此役，敌人宣称“毙匪二，伤匪三，毙马二，获枪一”。④蓝部又受一定的损失。

敌人仍紧追不舍。蓝六率部撤抵上青沟后，正在丛林间稍事休息，突见敌人攻到，遂抢占西山，起而抵御。双方经五小时激战，敌人攻占山头两处，蓝部以彼众我寡不敌，向丛林深处撤走。此役，敌人声称：“毙匪六，伤匪八，毙马五，伤马五，获枪四、马四、骡一、鞍三、军帽十二、子母袋五，羊毯、衣服、首饰等多件。救下人票邵永州等五名。我兵被伤一名。”⑤可见蓝部遭到较大损失，当然敌人也难免有夸大对方伤亡缩小己方伤亡之嫌。

不久，蓝六率部进抵郑家堡子。地方警团闻讯来攻，双方又起冲突。这次，蓝部打得很出色。“拒毙团丁十名，男女四名，……掠去枪弹，又绑票五名”⑥。

敌人眼看情况不妙，立即调来大批军警团丁，实行围攻。蓝六自知众寡不敌，硬拼徒遭损失，乃率部转至通沟旗杆岭，凭藉有利地形，严阵以待。敌人冒雨发动进攻，“伤匪二名”。蓝部被迫乘夜雨向宽甸县界半拌岭转进。7月5日，又在半拌岭与敌人接仗，战斗空前激烈，双方均有伤亡。敌人声称此役“毙匪十余名，马十余匹，伤匪甚多。……我军阵亡哨长一员、兵二名，伤四名。”⑦战斗一告结束，蓝六又率所部向别处转移了。

在半拌岭战斗结束后，蓝六即率部从宽甸、桓仁交界大南沟一带绕越山路重新进入桓境。民国4年（公元1915年）7月9日（夏历五月二十七日）午后二时，蓝六率部对桓仁县城发起进攻。此时，桓城警团被派往西南一带“防堵”，留在城中警团寥寥无几。县知事费国光闻警后，即偕同警察所长率警团出城迎击。但因“彼众我寡，匪势凶悍”，激战至暮，蓝部终于“绕山分路包围，隔断兵路”。⑧于六时顺利攻入城内。县知事及警察所长等，均被阻隔于城外，只好在山上放卡，又派人赴兴京报告情况，并设

法重整警团及征调外区巡警来援，以图挽救。蓝部攻入桓城后，敌人大肆攻击，宣称他们“开放监狱，搜掠款项，烧毁文卷，并警所房屋五间，商民房屋二十余间”⑨。据费国光致奉天将军张锡奎等电告，在进攻桓城战斗中，双方伤亡的情况是：“毙匪首洪字一名，伤匪五名；我警阵亡一名，伤一名”⑩。

桓城为蓝六攻占后，张锡奎、张元奇（奉天巡按使）即于12日电告北京政府，斥桓仁县知事事前不能遵电严防，致“匪迹一至，即时失守，咎无可辞”，请先行褫职，戴罪图功，限三日内“克复”县城，并派人调查该知事有无弃城逃走情事，以凭核办。同时又气急败坏，严电前敌各军，“星夜进攻”⑪。

10日黎明，敌人遂分路发动进攻，蓝六的队伍在县城停留了三天，又率部撤往县东横道川一带。张锡奎于接到桓仁县知事“克复”桓城的电报后，即复电令其“合力剿击，悉数歼除”⑫。同时，北京政府于接到张锡奎等13日关于“克复”桓城的报告后，也于15日以政事堂名义密电张等，转达袁世凯对于此事的“谕示”：“据报桓仁县已经克复，匪众窜扰横

道川各情形，著即会同严飭各军警协力追剿，迅速扑灭，勿稍松劲为要。并即将剿办情形及安抚商民、确查损失各节，随时具报，交内务、陆军两部查照。”^⑬可见其对于此事之重视。

蓝六率部退出桓城后，便转到桓仁、通化交界处继续活动。据通化县知事潘德荃电告：7月12日，蓝六率部进攻富尔江右，旋被当地警团击退。14日，蓝又兵分两路，分袭桓属英英沟、通属马蹄沟，并乘‘木排’进袭县属二道沟、江甸子等地。后通化警团越境进行偷袭，将木排击散，并“夺桓仁人票李姓”^⑭一名。又据东边镇守使马龙潭报称：同一天，蓝部在桓境南横路与“据险设伏”的傅管带所部发生战斗，力不能敌，失利退走。敌方夸大“战果”，声称此役“匪毙三伤十，毙马十一，获马二，子弹百余，鞍具、衣服甚多”^⑮。17日，蓝部开至通辑界横路四道江，驻天商号天和庆内。接着，在临江（今浑江）小乾沟，与警团交火，击毙其排长、团丁各一名；又在罗围沟地方，将警团打败，伤其六、七人，乘胜进至距通城仅四十里之处。然后会合其他各路民军，共马

步兵四百余人，借“雨急江涨”之机，三面围攻通城。其攻势凌厉，敌人不禁惊呼：“匪势狡悍，城内兵单，危急万状”①⑥。袁世凯闻讯后，即以统率办事处名义致电张钫銓等，责成他们“加派队伍，迅即扑灭，勿贻人口实，横生枝节，损碍大局”。①⑦在战斗中，敌人承认“匪多器利”，极其顽强，在“子弹如雨”中鏖战达十个小时之久，若非当夜大雨，行动不便，蓝部攻入通城，易如反掌。战斗结束，敌人宣称，此役“匪毙九伤三，团丁受伤一”①⑧。后蓝六为组织新的进攻，又率部退回四道江。

经此一战，通化知事心有余悸，深怕民军再次攻城，遂赶忙编成警团四百人，二百人用以“追剿”，一百人用以“接应”，一百人用以“防守”。张钫銓等也加派帮统王良臣驰赴兴京，会集各军，统盘筹划，包围堵击，勒限灭扑。并责成各县知事督率警团，“以防为剿，勿任窜逸”①⑨。加紧围攻步骤。张等还于20日将上述各情报告于北京政府，旋于22日得统率办事处复电，又传达了袁世凯的重要“谕示”：“著即督饬迅速剿平，勿任延抗，白狼之祸，

万不可再见于奉省。”②⑩这里，袁将蓝六等领导的人民反抗斗争与同一时期活动于豫、鄂、皖、陕、甘五省的白朗起义相提并论，既可见其重视程度，又反映其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自称“大都督”而被反动官府视为“杀人放火”、“大逆不道”的“巨匪”蓝六等，在涉及七县的广大地区，狠狠地打击敌人。他们英勇善战，神出鬼没，“三载于兹，终难擒获”②⑪，使敌人寝食难安。因此，在张元奇巡按使任内（1914年9月至1915年9月），被迫悬赏捉拿，并具体规定了赏格：如有生擒者，给洋五千元，击毙者，给洋三千元，并分飭陆防各军及各该官知事传知“一体计诱”。重赏之下，右路巡防马队第三营前哨哨官杨隆泰，遂觅雇了孟继贤、张维鳌等六人，让其“伪入匪伙”骗取蓝六的信任。10月3日夜，在宽甸县石棚地方，孟继贤等乘蓝六等熟睡之机，一举将蓝六及“蓝吕北大英字魁首”等四人一并用枪击毙，然后割下首级，赴营投报，并送往省城请验领赏。

蓝六等不幸遇害，但这场斗争并未因之而熄灭，

由黄四懒五率领的一支队伍，仍与革命党人联合，利用当时东边各省人民的“抗债闹捐”热潮，坚持斗争。使反动当局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侦闻巨匪黄四懒五投入乱党，急欲起事，注意安东，风声甚紧。防范虽严，仍难保无地痞密勾，使我人民抗债闹捐，诱令聚众纷纭，警防势难兼顾之际，伺隙窃发，星火燎原，乡民悔亦无及。”②

注：

①②⑬⑭⑰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②-⑧⑪奉天将军张锡銓巡按使张元奇1915年7月12日致北京大总统府等密电；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⑨⑩张锡銓张元奇1915年7月13日致大总统府等密电；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⑭⑮⑰⑱张锡銓张元奇1915年7月20日致大总统府等密电；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⑯北京统率办事处1915年7月19日复张锡銓张元奇密电；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②奉天将军兼巡按使段芝贵 1915年11月6日致统率办事处密电；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②宽甸县知事张纯熙1916年1月21日致段芝贵密电；奉天省公署档案。

日伪时期桓仁机构简介

白尔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一九三二年侵占了辽吉黑三省。为了长期霸占东北，奴化中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设立了日伪组织机构。现将日伪统治时期桓仁机构设置情况简介如下：

一、日本驻在机关和单位

日本守备队。一九三三年进入桓仁县，约有200余人，队长叫野田，直属于关东军。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讨伐。初来时住在东关（现在的医药公司院内），后迁到西关飞机场。

日本宪兵队。宪兵队是随守备队一起来的，约有20余人，队长野田勇夫。其任务除监督日本守备队军人行动外，更主要的是干特务工作。其中有少数朝鲜人，除做翻译外兼有侦探任务，侦缉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地址在现百货公司所在地。

东边道特别工作部。一九三六年成立，专搞特务活动。工作部负责人是朝鲜人韩某。

日本领事馆。一九三四年来桓仁设馆，人员不多，都是日本警察。总领事矢野俊，副领事中村义夫。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侨民(包括朝鲜人在内)，但也参加过屠杀和迫害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桓仁县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高下定二，军衔少佐。这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负责退伍军人的生活、集训、调遣、分配等特殊任务，设在伪县政府警务科内。

日本航空株式会社桓仁县出張所。负责人是日本人白起。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开始客运，每周定期通航三次，航线是从沈阳起飞，经由桓仁，再到通化，然后由通化返航，回到沈阳。这是桓仁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空航。可惜的是，中国人买不到飞机票，只好望航兴叹而已。

满铁桓仁县出張所。所长日本人梅村逸雄，直属于满铁株式会社。负责公路交通客运工作，在桓仁通化之间每天对开一次客车。后改为安东交通株式会社。

日本开拓团。是一九四〇年移民来的，迁来农民60户，260多人，团长夏井永吉。开拓团直属于伪长春日本开拓株式会社。名目上是开拓种地，其实

质是通过移民，侵占中国国土，同化中国人，达到“同文同种”的目的。

在满学校。是在一九三六年成立的，校长是朝鲜人金某。这所学校原是朝鲜学校，为了教育桓仁县朝鲜子弟而设立。因日韩一体化，强迫朝鲜人更名改姓，遂把这所朝鲜学校，改为日本在满学校。

二、伪桓仁县公署

伪桓仁县公署。1932年成立，地址在现政府广场前。是县里最高行政机关，日本人担任副县长，拥有最高的权力。县长是傀儡，从行政系统来说他只能对县公署各科发号施令，不能对其它机关插手干预。县公署下设两个办公室、六个科，科下设股，分别主管各自分担的任务。

县长办公室。曾任过伪县长的有周鼎、常荷禄、王育文、刘清一。

副县长办公室。初成立伪县公署时叫参事官，后改称副县长。参事官三轮健儿，副县长是三盐末雄、石垣贞一、樋口一郎。

总务科 科长 堤信义

行政科 科长 张国权

财政科 科长 钟振北

实业科 科长 徐志新

地政科 科长 日本人崛永吉

警务科 科长 王本富

三、桓仁伪协和会（详见文史资料第一集）

桓仁县伪协和会。一九三四年正式成立，全称是“满洲帝国协和会桓仁县本部”。地址在桓仁街西门里，原是日本领事馆馆址，后为协和会办公地点。协和会桓仁县本部长是由伪县长刘清一兼任，副本部长由副县长日本人石垣兼任。实行所谓“二位一体制”，即伪县公署和伪协和会同属一个系统、两个机构。本部内设有司务长一人，由日本人担任，专职负责伪协和会事务。下设总务班，指导班，青少年班。另有“妇人会”、“军人后援会”两个外围组织。在基层按行政区划设十八个分会，会长分别由十八个街村长兼任。

伪协和会有很大的欺骗性。利用这个标榜民意的组织，把所有机关和单位的头头都网罗在一起，听从日本人副本部长随意摆布。既可以独揽大权，又可以

显示民意，这是日寇对伪满统治的手段。

四、县公署所辖十八个街村和七个警察署

十八个街村：

桓仁县街公所	街长	杨春华
二道岭子村公所	村长	董福先
横道川村公所	村长	王绍通
四平街村公所	村长	荣尚义
沙尖子村公所	村长	王芝田
五里甸子村公所	村长	陈晓江
六道河子村公所	村长	孙廷双
二户来村公所	村长	王禹川
华尖子村公所	村长	黄义忠
木孟子村公所	村长	袁裕民
八里甸子村公所	村长	吕之业
雅河口村公所	村长	姜春湖
普乐堡村公所	村长	魏永秀
泡子沿村公所	村长	潘玉璞
拐磨子村公所	村长	马忠礼
北甸子村公所	村长	陆守田

业主沟村公所 村长 佟汇川

响水河子村公所 村长 曲元伯

七个警察署：

城关警察署 署长 徐万程

横道川警察署 署长 黄贵福

沙尖子警察署 署长 范 斌

二户来警察署 署长 孙学章

华尖子警察署 署长 黄金兰

八里甸子警察署 署长 教维国

拐磨子警察署 署长 朱文元

五、县内其他机关和单位

桓仁县法院 院长 郇焕文

桓仁县检察院 检察官梁澍霖

桓仁县税务局 局长 刘 某

桓仁县邮政局 局长 赵 纯

桓仁县电报局 局长 王华春

桓仁县电话局 局长 丁跃南

桓仁县专卖局 局长 王化清

桓仁县水电局 负责人日本人

伪满中央银行桓仁支行 经理卢鸿顺

桓仁县兴农合作社

桓仁金融合作社

桓仁县柞蚕株式会社

桓仁县商工公会

桓仁县农务会

桓仁县图书馆

桓仁县南关师中学校（后改为南关小学）

桓仁县国民高等学校

桓仁县女子小学

桓仁县北关小学

桓仁县西关小学

桓仁县教养工厂

桓仁县大兴当

桓仁县协荣公司（经营桓仁丹东之间客运）

桓仁县林兴站

桓仁县管烟所

桓仁县监狱

桓仁县保安队

桓仁县二棚甸子铅矿

六、宗教、民众团体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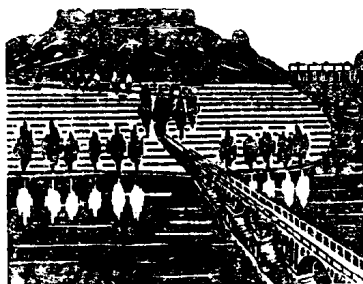
桓仁县基督教会

桓仁县天主教会

桓仁县佛教会

桓仁县道德会

桓仁县道院



日本侵略者在桓仁的罪行

王明玉 白尔洁 供稿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继而于1932年10月16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桓仁县城。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罪行累累，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页。

一、强化机构，实行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为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首先强化了统治机构。

建立警察大队，成立警务局。日军进占桓仁县城以后，汉奸徐文海也带兵进入桓仁县城。为强化治安在桓仁最先建立警察大队，成立了警务局。警务局在县城、横道川、沙尖子、普乐堡、八里甸子、窟窿榆树、二户来、铧尖子、业主沟和拐磨子下设10个警务分局，并增编军警人员。同时，将徐文海部下的8个连改编为8个中队，分驻各警务分局。司令徐文海任警察大队长，计805人，作为日本守备队镇压桓

仁人民的帮凶。

改县政府为县公署 日军将原县政府改为 县公署。县公署内设警务科（警务局），下设警务股、特务股、司法股。配备日本指导官 4 人，警长 3 人，警士 5 人，无线电技术员 2 人，鸠信班警士 2 人，共计 16 人。此外，县城内还驻日本守备队，日本宪兵队，长岛特别工作班等，做为统治桓仁人民的工具。

改警务分局为警察署，实行保甲法 1933 年，日本侵略者又将全县 10 个警务分局改为 10 个警察署。窟窿榆树警务分局改为四平街警察署。县城内增设了看守所。同年 12 月实行保甲法，将全县 10 个区划为 10 个保、95 个甲、1580 个牌。设保甲自卫团 10 个，计 584 人，驻守各保，以补助各警察署警力。这时，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出动军警、特务和日本守备队进行搜捕，杀害无辜；另一方面，强迫群众修整飞机场和乡道，为日军“讨伐”服务。

组建协和会等组织 日本侵略者除强化统治机构外，又组建了所谓群众组织和教育组织，为其法西斯殖民统治服务。1934 年在县城设妇女联合会，

会员 140 人，由日本人田代美智任顾问。5 月，成立日满协和会，由伪官吏、地主、士绅等组成，下设 9 个分会，专门宣传“日满亲善”，麻痹中国人民。同时，成立了 3 个日语学院，招收学员 1072 人，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制造合法舆论。同年 12 月，又成立了桓仁县社会教育委员会和体育委员会。在学校里一律开设日语课，实行奴化教育，推行日本新政，贯输奴化思想。1935 年 5 月，又成立了道德会桓仁分会，声称改善社会，缔造大同，促进世界，谋辟幸福，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实际搞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把戏。这些所谓群众组织，都是奴役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

东边道特别工作部 1935 年在桓仁成立，是日本宪兵队分支机构，共 20 多人。工作部成员除会计柳士达外，都是朝鲜人，他们极为凶残，专于刺探情报，瓦解劝降，审讯逼供，处置所谓犯人的勾当。被抓进特别工作部的人，如不投降日寇，就难以活着出来。所以，东边道特别工作部是一个暴力的特务机构。

二、强行归屯,实行“三光”政策

日本侵略者把对东北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进行围剿、屠杀和镇压称为“讨伐”，也叫“治标”。在“治标”的同时，他们还大搞所谓“治本”。强行归屯就是他们“治本”措施之一。

1935年秋，桓仁县开始“归屯”。日本侵略者把各沟各岔分散居住的农民，强行归到指定的大围子里去住，把原来的民房全部烧光，制造无人区，妄图以此隔绝人民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切断群众在物质上对抗日联军的支援。大围子四周挖有很深的壕沟，壕上修筑土墙，并围上铁丝网，有的还修有炮楼。各大围子都设有警备所，配有10~20名武装警备人员，日夜站岗放哨，检查行人。大围子实行连保连坐，一户“犯法”10户遭殃，一人“犯罪”株连亲友。日本侵略军为了推行“治本”计划，1936年在桓仁建立伪法院，实行新的街村制。全县10个区划为20个村、264个自然屯。街、村设街、村公所，自然屯设屯公所。

日本侵略者在强行归屯过程中，对人民群众大施

淫威，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房屋化为灰烬，人民惨遭杀害，财物被洗劫一空。每个大围子都有被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的血泪史。

烧毁村庄 1934年2月12日（农历腊月29日），仙人洞的村民们正准备过春节。阵阵北风吹来，卷起地上的积雪，雪沫子满天飞扬，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只听由远处传来纷杂的马蹄声、人的尖叫声。这是由平顶山方向来的100多名日本兵，进村后，前边骑高头大马的那个鬼子把战刀一挥，“哇啦”一声，这群手持雪亮刺刀的日本兵，就放火烧房子。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仙人洞村变成了一片火海，80多户房屋烧得净光，200多人无家可归，村舍变为废墟，田园化为焦土，残墙断壁，满目疮痍。1935年春到1936年秋，横道河子、高台子两村，被日军烧毁房屋280多间，有80多人致死，有很多人在饥寒交迫的流浪中丧生。

滥杀无辜 1935年12月12日（农历冬月17日），下露河的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队共90多

人，来到外岔沟和夹皮沟一带，强迫群众归屯。夹皮沟村的张德盛，这年45岁，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全家7口人，五个孩子，两女、三男，大的14岁，小的未满月。一家人都没穿上棉衣。穷凶极恶的日本兵搜索到张家，用刺刀逼着一家7口人走出破草房，与其他20多无辜的农民一起，被赶到浑江岸边。一个日本兵喊了一句日本话，只见那群日本兵蜂拥而上，硬逼着这些无辜的农民往江水里跳。农民们屹然不动，紧握拳头，怒骂日本兽兵。惨无人道的日本兵用刺刀刺进农民们的后心，把30多名中国同胞推进江中。片刻之间，鲜血染红了浑江水。张德盛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推进江水以后，凶残的敌人又从他妻子怀里夺去未满月的三儿子扔到江中，并撕开张妻的衣襟恣意取乐，不甘忍受侮辱的张妻用衣襟蒙上头跳入江水中。

“万人坑”事件 铎尖子村后有个庙沟，是日本侵略者在桓仁杀人最多的地方，称“万人坑”事件。

1937年3月2日下午，日寇带领铎尖子警察、保甲兵20多人，到高台子村抓人。顿时，高台

子全村呈现一片恐怖景象。如同恶狼的日伪兵首先闯进刘喜尧家，不问缘由便把刘喜尧及其妻子和16岁的女儿捆绑起来。然后，在全村搞大搜捕，共绑走15人，都被带到铧尖子警察署。晚上，日军队长水野，亲自对这15个无辜的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晚10点多钟，水野兽性发作，将刘喜尧的女儿拉到自己的住室进行强奸。第二天，毫无人性的水野又把她送给一个姓魏的伪警察，供其玩弄。刘喜尧夫妇和另外13名农民被拉到庙沟的“万人坑”枪杀了。

水野以及警佐菊池等人每次去庙沟杀人，都是前边绑着一长串将被杀头的桓仁人民，后边跟着抬刑具的伪警察和保甲兵。在砍杀人时，不是先割鼻子或耳朵，就是割掉舌头，有时吆喝狼狗扑咬，野兽们站在一旁拍手称快，直到把人折磨得鲜血淋漓后再把人头砍下来，挂在庙沟周围的树上。那时的庙沟血肉横飞，尸骨遍野，狗吠、狼嚎、乌鸦叫，一片凄惨景象。

菊池、水野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恣意折磨、凌辱中国人。每次刑讯不分男女，先把受害人的衣服剥光，然后用皮鞭抽、烙铁烙、灌凉水、坐老虎凳等

酷刑施以折磨，有时用针扎下部和乳房，用火炭烧阴毛来取乐。一次，水野从川里谷草垛沟抓来刘家夫妇。审讯时，把他们的衣裤剥掉，逼着他们站在野兽面前。审讯后，水野怪腔怪调地说：“你们两个的两口子一回，死啦死啦的之前干一次吧。哈哈……”随着他的笑声，手下人便动手往一起推，强逼刘家夫妇交媾。女的不堪忍受野兽们的污辱，用手捂着脸跳进烧刑具的火堆里。最后，刘家夫妇也被拉到庙沟砍杀了。

水野这群野兽在铎尖子警察署仅驻3个月，有100多无辜群众死于他手。那时，在铎尖子、木孟子、横道河子、高台子一带，处处都可以见到日寇在杀人、放火；沟沟岔岔都可见到被敌人杀害的尸体。

三、施布暴力，实行白色恐怖

日本侵略者霸占东北14年，制定公布了一连串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在桓仁建立暴力机构，赋予宪兵警察以无限的特权，对桓仁人民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中国人的一言一行稍有不慎，便被扣上“思想犯”、“经济犯”、“嫌疑犯”等罪名，遭到逮捕和

严刑拷打，许多人为此惨遭杀害。

血染西江 1937年2月3日(农历正月十三)早晨8点钟左右，日本守备队在桓仁县城西江沿约一公里内实行戒严，断绝行人与车辆通行。警察四处奔跑，把堵截的行人与城里抓来的数十人一起驱赶到西江桥下50米处，砍大冰窟窿。城内交通要道也放了哨卡，整个县城呈现一种恐怖气氛。上午10点左右，砍冰窟窿的人被赶到江两岸的柳树趟子里，由日本兵看守，趴在地上不让动。这时，有4辆卡车驶来，满满的4车人都被反绑了手，戴着大脖扣，堵着嘴，由警察搜查班和警察训练班的警察押着。汽车喇叭声长鸣怪叫，令人毛骨悚然。车刚停下，就把车上的人扔下车来，强迫跪在冰窟窿边上。很多人立而不跪，不断传来怒骂声。只听日本守备队长野田“哇啦”一声尖叫，日本兽兵端起刺刀怪叫着刺向受难同胞，然后将尸体填进冰窟窿里。4辆汽车往复3趟，共拉11车。后来的受难者中，有的被活生生的推进冰窟窿里。一时浮在水面上的，日本兽兵便用长木杆子往江水里捅，填江兽行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多钟。

尸体堵拦着江水，鲜血染红了江面，300多名同胞就这样被填江杀害，其情景惨不忍睹。这些死难者大多数是坚持过抗日的自卫军战士，被俘的红军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以及被认为是“通匪”的无辜群众。这些人中有的被骗到西关守备队领取所谓《良民证》被抓获惨遭杀害的。

填江事件之后，整个西江沿叫哭连天，死难者家属携儿带女络绎不绝，每到夜晚一片灯笼火把，一直延续一个月之久。待到春暖江开，尸体顺江漂流数十里，江岸的沙滩上、柳树趟子里到处可见受害者尸体，情状十分悲凉。

骇人听闻的西江惨案之后，日本侵略者接着在全县各地搞大搜捕、大屠杀，制造白色恐怖。1937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四日），二户来警察署在二户来南门外河边枪杀11人。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拐磨子警察署抓12人，在老黑漫子枪杀填入富尔江的冰窟窿里。沙尖子警察署在马圈子枪杀10多人，其他警察署也都先后成批抓人杀人，死难者无计其数。

“救国会”事件 1936年9月，桓仁街街

长盖洪周得知士绅金聚庭念大学的儿子金伯起，从关内给金来过一封信，便添油加醋地向日本宪兵队报告了。日本侵略者借此大作文章，以“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大肆搜捕所谓救国会组织成员。以教育界为中心，株连各界，仅2天时间，逮捕爱国人士70多人。所逮捕的人分别押在宪兵队和东边道特别工作部，进行严刑逼供。10月间又被押送沈阳陆军监狱，1937年以莫须有的罪名分别判了刑。这70多人惨遭迫害，死在监狱4人，被处死10人，无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10~15年的41人。受难者的亲属也遭受到种种虐待。

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和殖民统治，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于1933年9月10日公布了《惩治叛徒法》，1941年12月27日公布了《治安维持法》，1943年9月18日公布《思想矫正法》，1944年6月12日又公布了《时局特别刑法》，规定的各种罪名50多种。说一句“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吃一口大米，就是“经济犯”，夜间不准插门，不准留宿，查出留宿者以“通

匪”、“思想不良”罪加以逮捕。人民群众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一言一行都受到限制和监视。为了奴役中国人民，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日满协和”、“日满一家”，一心一德建设王道乐土的反动观点，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各中、小学校开设政治课，篡改史历、歪曲事实，向小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日满亲善”的奴化思想。他们还从伪通化军区调来一名上尉军官，以桓仁县国高学生为主，强制实行军训。

四、恣所欲为，实行资源掠夺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战争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同对各沦陷区一样，对桓仁县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

日本开拓团 1940年从日本本州岛的秋田县移来桓仁一个所谓开拓团，共73户260口人。开始都住在普乐堡，第二年又移出20户迁到二户来龙头居住，强占普乐堡、二户来良田4.500多亩。开拓团由长春日本开拓株式会社管理。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定的从1937年到1957年，20年内由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庞大计划的一个

实际步骤。通过移民方式，占领农村耕地，掠夺农业资源，妄图实现永远占领东北的野心。

抓 劳 工 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掠夺我国资源的各项计划，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到处设立劳工管理机构和招募机构，以招骗、强征和抓捕等手段，从各地掳掠大批劳工，从事各种劳役。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当牛做马，受尽苦难。其受害之深，遭遇之惨，死难之多，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当时，在桓仁县伪政府行政科设一个勤劳俸仕股，股长是日本人，专管抓劳工和勤劳奉仕。所谓勤劳俸仕，即是把抓劳工制度化、法律化。规定：凡是未被检查上国兵的人，都应该尽勤劳俸仕的义务。被选定为勤劳俸仕队员，在从事沉重的劳役过程中，如有怠工、滋事、逃跑等行为，要找家长问罪。桓仁的劳工主要在泡子沿修水电站和在二棚甸子开采铅矿。劳工们集中住在阴暗潮湿的劳工棚里，吃的是混和橡子面。在一起不准随便讲话，大小便要统一行动，夜里大小便要经批准，吃饭也有口令动作，有病不给治疗，死了便拉出去喂狼狗。劳工集中营是一座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征收“出荷粮”和苛捐杂税 从1940年秋开始，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向农民征收高额的“出荷粮”，大量掠夺农民手中的粮食，实行生活品配给政策和繁重的各种税收政策。

贩卖鸦片，摧残人民 1934年在桓仁县城指定私人成立了几个鸦片零卖所。1935年县城成立管烟所，实行鸦片专卖制。这样以来，种大烟的，吸鸦片的，扎吗啡的人数骤然增加。染上烟瘾者，骨瘦如柴，有的倾家荡产，有的中毒身亡。

在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下，美丽富饶的桓仁变成一座人间地狱。从老秃顶山下到刀尖岭巅，从富尔江畔到浑江两岸，到处白骨累累，血迹斑斑。日本侵略者把桓仁人民推进灾难的深渊，其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桓仁铜锌矿开发简史

王学良 供稿

桓仁铜锌矿（原名桓仁铅矿）是一座有近百年开发史的老矿。自清末以来，除部分战乱年份，几乎未间断过采挖。至建国初期止，大体可分为三个开发经营时期。

原始开发时期

早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桓仁县居民阎廷文等人到二棚甸子滚马岭地区（现为桓仁铜锌矿的向阳坑），利用土法挖掘地表露出的铅锌矿，所采无几，自行熔炼，不久就停办。

1918年（民国七年）由奉天城（沈阳）的汪某、钱某、胡某三人合伙，以手掘方式开采。到1920年采出方铅矿约25吨，后因铅价跌落，不能获利而放弃。

1927年（民国十六年），由奉天省长开设的私人资本“奉铁公司”，雇用50多人，以手掘方式，先后在滚马岭、松兰和马圈子等地开凿2个斜

坑，1个水平巷道，1个地井。历时三个半月，采出一些铅锌矿，结果因耗费成本过高，无法支付工人应得的工资，被迫停止经营。

日伪经营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这座矿山沦为他们掠夺中国地下宝藏的主要基地之一。

1937年3月28日，先由日本私人资本家胜首和中国人盛庆祥来到二棚甸子地区调查，并雇工20多人进行开坑探矿、采矿。

1938年10月17日，由伪满“矿山株式会社”接管经营，在松兰、西岔、滚马岭等地进行勘探，同时进行了采矿。特别是在中日战争的深入阶段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急于掠夺矿山资源，于1940年修建选矿厂，1942年7月投产，直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迫停止生产。

一、日伪经营时期组织机构与人员情况。所长主辖，下设庶务科（会计系、秘书系、庶务系、警备系、病院）；采矿科（采矿系、西岔、滚马岭、松兰、测

量系、索道)；劳务科(劳务系、供给系、西岔结所、松兰结所)；调度科(铁工厂、运输系、调度系、电气系)；选矿厂。

1938年第一任所长是日本人谷田海，第二任所长日本人安孙子，第三任所长日本人渡边敬一。

矿山株式会社管理人员92人，其中日籍人员82人。工人有1500人(采矿1050人，选矿150人，机械、电气、运输180人，其他为120人)。

二、生产规模及采选状况。探矿主要在滚马岭、西岔、松兰和马圈子的大北岔、小南岔进行。先后掘进长度不等的坑道40多条，总延长为10551米。其中三分之一的是以手掘方式开采。采下矿石(按金属量计算)：铅5008吨，锌9134吨，铜181吨。还有副产品金、银、硫等。这些产品分别运至日本国和沈阳冶炼。

水平坑道凿进效率，1939年为0.86米/台班，1940——1943年分别下降为0.76米/台班，0.71米/台班。采矿效率，几年间保持在

5~7吨/台班。

出矿和选矿处理矿量逐年上升。1945年出矿量每月平均近万吨：选矿日处理矿量1943年为100吨，1944年为150吨，1945年达到400吨，全年处理矿量总数为84813吨。选矿实收率，1942——1945年平均为铅85.5%，锌74%，铜85.3%。

1944年，这座矿山的产量占东北境内冶金矿山总产量的比例是锌占52%，铅占17%，铜占3%，银占16%（铅精矿含银金属）。根据当时探矿工程结论，推算地质储量总计为22万吨，其中含铅金属7913吨，含锌金属20687吨，占东北地区总埋藏量的15%。

三、矿山的生产设备。由于矿山资源丰富，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贪欲，逐年增添投资，尤其从1940年以后的几年间，选矿新增一套生产机械设备，到1945年8月，矿山的主要设备有下面几种：

采矿设备：压风机7台，计750马力，锻钎机

3 台，凿岩机 58 台。

运输设备：汽车 30 辆，每台载重为 2 吨。矿石运输，松兰矿石用架空索道运往西岔装卸场，然后由西岔索道运至选矿厂。

电气设备：变压器 13 台，其中 1500 KVA 3 台，500 KVA 7 台，300 KVA 3 台。

选矿设备：8'×3'球磨机 2 台，2.5m×7.5m 分机 2 台，浮选机 120 台，20×10 老虎口 1 台，3B 型锁链给矿机 3 台，3"砂泵 7 台，30'×3'浓密机 2 台，滤过机 3 台，真空泵 4 台，3HP 水泵 2 台，15HP 压风机 2 台，8'车床 2 台，12'、6'车床各 1 台，24'平刨床 1 台，20'眼床 1 台。

四、在日伪掠夺开采中，中国矿工深受残酷剥削与压迫，他们不断地反抗和斗争。1938 年 4 月 15 日，西岔坑 31 名工人，因工资低进行了 14 天的大罢工，直到矿方答复给增加半天工资才复工。

1944 年 8 月，西岔坑 150 名工人，由于反抗日本人荒木殴打中国“报国队”，罢工 3 天，迫使所长

渡边敬一与当地政府共同出面，向挨打工 人赔礼道歉，并表示以后不再打骂中国人。

恢复生产时期

一、1945年“九、三”光复后，特别是1946年10月至1947年3月，国民党占领桓仁期间，矿山的机电设备、物资、厂房遭到严重破坏。据1949年9月我政府接收矿山时的调查统计资料记载，其破坏程度：选矿机械为67%，采矿机械47%，电气设备99%，宿舍70%，厂房90%。

1949年9月25日，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有色局，派长春地质调查所的地质与测量人员30余名，来矿进行35天地质情况考察，认为很有发展前途和开采价值。其后由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有色局作出恢复铅矿生产建设的决定。为防止矿山继续遭受破坏，同年10月派出王明洲等人前来负责接管工作，并组成以机械、电气、土建为主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对恢复矿山生产需要的设备和新建项目进行了调查和规划，历时15天，11月2日返回沈阳，着手编制计划，开始施工设计工作。

1950年2月，东北有色局派孙建华任矿长，段耀林任副矿长。接着从桓仁县委调来13名干部，并支援21名保安人员。

为加强修建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桓矿修建委员会。先后设：计划科、采矿科、技术科、经理科、工务科、保卫科、人事科、福利科、基建股、保安股、选矿股、文书股、万宝探矿队、警察队等16个行政管理机构。职工队伍由1950年的924人发展到1952年的1910人，其中生产工人1318人，管理人员262人，工程技术人员50人，服务人员280人。

二、1950年3月，修建开始。修建工作坚持以建设厂房、维修设备为重点，采取清扫现场，拆卸残体，重新组建三个步骤。在广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发动群众，依靠骨干，思想领先，开展竞赛，克服困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许多职工为加速矿山建设献计献策，有的对购买木材、砖石提出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节省资金2万元，有的主动献出滚珠轴承、管链子等工具材料，有的机电工人

从废料堆里修成钻床1台，起动机2台，探矿工人修复旧凿岩机38台。土木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拣来打水泥用的石子。许多工人与干部起早贪黑，节假日不休息，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这一年修建厂房5562.4平方米，职工宿舍6658.6平方米，集体福利设施1785平方米，修建坑内棚子250架，完成机电工程计70%。

1951年继续进行修建，一方面以修建变电所为主，抓紧完成剩余的机电安装工程，另一方面下掘竖坑，积极作好坑道的整修，并新建职工宿舍1200平方米，主动承包通化电业局规划的由桓仁到铅矿之间18公里送电线路工程。到6月末第一期修建项目全部竣工。8月13日，通化电业局开始送电。这个时期国家投资763.3万元。

三、1951年9月，矿山正式恢复生产。累计到1952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28万元；掘进完成4256米，采矿15571吨，保有地质储量94.3万吨；完成处理矿量13790吨/年。产出铅含量241吨，精矿品位61.49%，回收率

83.97%，锌含量814吨，精矿品位56.22%，回收率85.5%。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由于选矿厂生产成绩显著，处理矿量水平迅速提高，年回收率超过计划8%，受到东北有色局表扬，并授予“保证安全运转，继续提高回收率”的奖旗一面。

实践证明，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不仅提前四个月完成修建矿山的艰巨任务，而且取得恢复生产的良好开端，并为迎接“一五”计划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桓仁水田开发溯源

赵玉森 邵文津 供稿

桓仁水田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有朝鲜族农民，利用河水、山涧溪水、泉眼泡子开发水田。

据：《东北朝鲜历史研究》（朝鲜文，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一书中记载：“东北朝鲜族居住区的耕作水稻，是1875年（光绪元年）由通化上甸子、下甸子传播开来的。以后邻县兴京（现在新宾）柳河、桓仁等地朝鲜族居住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兴京、旺清门、三源浦等地区变成闻名的水田区”。

据：《在满及西伯利亚地方朝鲜人事情》（日本文）一书中记载：“在东北辽宁地区的水稻栽培，始于1875年，最早是在鸭绿江右岸的奉天省（现在沈阳）通化县的上甸子、下甸子地方的朝鲜族农民从朝鲜代来稻种，开垦沼泽地，造作水田，试种成功。从此水稻栽培迅速传播到辑安、桓仁、兴京、柳河等

地”。

据上述两本书文记载，笔者曾去通化县考察过，经通化县地名办公室确认，通化县从建县以来，无有叫上、下甸子的村或自然屯。只有拐磨子镇有上甸子村，洼泥甸子村民间叫过下甸子。是否桓仁所属，还无籍考证。只能从上书中记载推测，在百年以前就有劳动人民在桓仁境内或邻近地区栽培水稻。

从桓仁境内的考察情况来看，也可说明百年以前就有了水田的开发。据：业主沟乡碱厂沟村崔相久老人回忆，早在1886年有利用豹子洞沟水，开成100多亩水田，这是碱厂沟一带最早水田开发地点。

四河乡三道河子村白士克的父亲利用三道河子水，于1905年开成10余亩水田，当地农民第一次见到水稻。

雅河乡雅河口村朴元守老人回忆：1906年前后，一位姓洪的朝鲜族人，给辛二老爷抗活，在现在雅河中学门前洼地开成一块水田，是雅河地区水田开发最早地点。

据王凤山同志介绍：他的祖父于1900年（即八国联军侵占中国）迁到本溪，第二年从本溪又迁到桓仁县的北甸子纪家街，给朝鲜人抗活，当时英英沟河两岸就有很多水田。

五里甸子镇桦树甸子村老农李庚和回忆：1912年前后，从朝鲜过来的农民，利用小河水，开过水田。

拐磨子镇洼泥甸子村老农宋成兴回忆：早在1914年，康凤道利用干巴江水开了20多亩水田。

1922年，也就是中华民国11年的初冬，从安东（现在的丹东）搬到桓仁县北拐磨子沟门西山头一户朝鲜人叫金永浩，全家五口人（老伴、仨孩子）。他住在朴家大院套里的西下屋，租种朴海峰的地，转年春天他就张罗租张永洲的土地挖水壕，修起一座树石坝，从西山头到老朴家大院门前，引拐磨子河水灌溉，每年付给三石粳租子。这年他雇用两名长工、种有三十来亩水田，当年获得了大丰收。他连续种了三年，（不是畦苗插秧，而是撒种的漫板子）

都获得了好收成。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陆续搬来了不少朝鲜人，老朴家三大份上百亩的旱田地也逐渐开成了水田。

普乐堡镇地区，1917年朝鲜族金钟旭在大青沟，引小河水开了头一份水田。

从上述资料和有史记载推算，确属在1000年以前，在桓仁境内就兴起开垦水田。据史记载：1922年（民国十一年）全县水田面积为5000亩，1923年全县水田面积为2万亩，1924年全县水田面积21500亩，1925年全县水田面积达到29026亩。由于1926年春，全县遭受一场大旱，全县水田改为旱田876亩，水田面积为28150亩。到1945年解放前全县水田面积达到31850亩。

桓仁解放前后医药卫生行业

初传庸 供稿

桓仁县医药卫生事业，在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巫到医，医巫交替，以医为主；从一般的医疗，到能诊治一些疑难病症的发展过程。

一、清末、民国、伪满时期的私营医药业

据考证，从清光绪三年（1877年）建县后的十多年间，既没有官方设立的医药管理机构和防治机构，又没有私人开设的中西药房（店、铺），人们生了病，只靠求神拜佛，听天由命。虽有少数业医和游医，大部份分散于各村屯，由于医术低，药价高，加之行踪不定，劳动人民求医治病是十分困难的。广大农民生疮害病只好求神讨药，巫医神汉借机横行乡里。因此，用迷信的方式治病到处可见。

1894年（清光绪20年），在沙尖子干沟

子，出现了一位用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抢救一名九死一生危重病人的老张先生（老中医刘恕令的老师）。从那时起，桓仁出现了比较有名望的中医中药人员的踪迹。到清光绪28年（1902年）8月，“自厚生”中药房在桓仁街开业，这是桓仁建县后最早开业的中药房。以后又有“聚兴福”中药房在二户来开业。

而西医的出现，并且在治疗上很有名声的是“同升医社”的刘同升老大夫（医学士、毕业于沈阳小河沿英国办的医科大学）。他在1933年10月为桓仁镇南关“万合顺”二财东吕汉章之妻孙志刚（26岁），做了剖腹产手术首例成功，使母女平安。从那时起，西医的传入和治疗在桓仁逐步打开局面。

据史料记载和调查：清末，全县有中医药业2家，从业人员21人。民国时期，全县有中药房（店、铺）16家，从业人员70多人。日伪时期，全县有中药房（店、铺）40家，从业人员143人；西医诊所（当时的医社）7家，从业人员15人。

有关清末、民国、伪满时期的私营，中西医药开业点，详见附表。

清、民国、伪满时期全县医药保健行业统计表

1902—1944年

营业种类	商号名称	资本主	经理人	从业人员	开业年月	资本额(元)	地 址
中医	自厚生	王毓筹	王桂东	15	光绪28年8月	3,000	城 镇
药业	聚兴福	刘成奎	刘成奎	6	宣统元年1月	300	二户来
"	魁发德	霍焕章	霍焕章	3	民国元年3月	300	沙尖子
"	永和长	杨德元	苏瑞麟	17	民国2年3月	2,400	城 镇
"	志和祥	宋其昌	李子辅	7	民国9年3月	700	沙尖子
"	人术堂	李逢春	李逢春	2	民国10年2月	200	城 东
"	同义公	高殿贵	高殿贵	4	民国12年3月	100	二户来
"	恒春源	王庭绪	王庭绪	3	"	"	业主沟
"	吉祥生	孟希贵	孟希贵	7	民国12年4月	200	二户来
"	春和长	于香泉	于香泉	3	民国13年6月	120	城 镇
"	春盛东	王德武	赵玉春	6	民国14年3月	700	沙尖子
"	顺兴成	王文元	王文元	2	民国17年10月	200	二户来
"	中兴福	宽容堂	杨中正	5	民国19年4月	700	城 镇
"	永源庆	苏瑞麟	魏永堂	5	民国20年2月	400	"

清、民国、伪满时期全县医药保健行业统计表

营业种类	商号名称	资本主	经理人	从业 人员	开业年月	资本额 (元)	地 址
中医 药业	怡庆堂	荣滋园 王善家 王善乙 卢浚泉	卢浚泉	10	民国20年5月	5000	城 镇
	" 东聚祥	侯秀东	侯秀东	3	大同元年1月	100	拐磨子
	" 万太祥	郭万和	郭万和	1	大同2年2月	100	"
	" 天升恒	罗永太	罗永太	2	康德元年2月	100	横道川
	" 福兴长	藏凤来	张凤来	1	康德2年1月	100	"
	" 永盛德	兰春芳	兰春芳	2	"	100	华尖子
	" 德太东	孟宪德	孟宪德	1	康德2年3月	40	普乐堡
	" 同协玉	张尊九	张尊九	2	康德2年4月	50	二户来
	" 天顺源	刘清源	刘清源	2	康德2年5月	50	八里甸
	" 德顺兴	贾守兴	贾守兴	1	"	50	岔龙江
	" 东和堂	侯芹亭	侯芹亭	1	康德2年6月	100	沙尖子
	" 中和祥	李雨三	李雨三	2	康德2年7月	55	普乐堡
	" 益春堂	王益亭	杨占东	2	康德3年1月	200	沙尖子

清、民国、伪满时期全县医药保健业行统计表

营业种类	商号名称	资本主	经理人	从业人数	开业年月	资本额(元)	地 址
中医业	福盛长	扈逢春	扈逢春	2	康德3年3月	100	八里甸
"	志太源	杜守业	杜守业	1	"	80	"
"	同春堂	李丰亭	李丰亭	1	"	50	川 头
"	庆源李	李凤翔	李凤翔	1	"	50	老岭沟
"	永盛和	孟雅亭	孟雅亭	1	康德3年4月	50	华尖子
"	同太仁	范登伍	范登伍	1	"	50	横道川
"	顺 记	王成功	王成功	3	康德3年5月	200	沙尖子
"	六合春	钟云汐	钟云汐	5	康德5年3月		城 西
西医业	大林诊所	齐大林	齐大林	2	1929年1月 民国18年		桓仁镇
"	汝舟医社	姜汝舟	姜汝舟	3	大同元年10月	100	城 镇
"	同升医社	刘同升	刘同升	3	大同元年11月	300	"
"	惠仁医社	韩铭阁	韩铭阁	3	大同2年9月	60	二户来
"	仙洲医社	李仙洲	李仙洲	2	康德元年12月	100	沙尖子
"	济民医社	王海林	王汝霖	3	康德2年11月	150	镇 东
"	仁母医社	曲云海	曲仁海	3	康德3年3月	200	二户来

清、民国、伪满时期全县医药保健行业统计表

营业种类	商号名称	资本主	经理人	从业人员	开业年月	资本额(元)	地 址
镶牙业	广忠院	张广忠	张广忠	1	民国20年4月	150	城 镇
"	麟阁牙院	吴宝勋	吴宝勋	1	康德元年10月	50	"
"	子经牙院	宋子经	宋子经	1	康德2年12月	"	"
"	广久院	张广久	张广久	2	康德2年4月	30	二户来

二、光复后至全行业公私合营期间的私营医药业

1945年光复以后，至1956年6月全行业公私合营期间，中西医药业及镶牙业中，有的是解放前开业而延续下来的字号，只是人员有很大变动。有的虽然在解放前开业，但在历史资料中没有记载，均为经过调查和在医务人员个人档案材料中查对所得。其中半数商号和人员解放后停业出走，个别人员另操他业而改行，多数是解放后开业的。

附：光复后至全行业公私合营前中西医药业情况统计表：

光复后至全行业公私合营前中西医药业情况统计表

营 业 类 别	商 号 名 称	经 理 人	开 业 年 月	从 业 人 员	地 址	备 注
西 医 诊 所	大林诊所	齐大林	1929年1月	2	桓仁镇	1948年4月参加 济桓医院工作
"	仙洲 医社	李仙洲	1934年12月	2	沙尖子	1948年8月参加 工 作
"	济民 医社	王汝霖	1935年11月	2	桓仁镇	1946年8月参加 济桓医院工作
"	风蒲 医社	张风蒲	1939年4月	1	"	1950年参加 县立医院工作
"	新生 院医	陈树杰	1945年10月	1	"	1951年参加工作
"	宇斌 诊所	王宇斌	"	1	"	1950年参加工作
"	保康 医社	孙 廉	"	1	"	"
"	达太 诊所	祁达太	"	2	"	1951年8月参加 工 作
"	爱生 医社	丁克任	1942年9月	1	二户来	1951年5月参加 工 作
"	怀仁 医院	王恩民	1948年2月	2	桓仁镇	1956年参加联合 诊 所
"	志英 医院	常志庭	1948年2月	2	"	1952年参加县医 院 工 作
中 医 药 业	正大 药房	魏增寿	1946年6月	2	"	1948年转通化
"	六合春	钟云沙 宋成良	1938年5月	5	"	1946年散伙
"	中兴福	杨中正	1930年4月	3	"	1956年停业
"	永和长	苏瑞麟	1913年3月	17	"	"

光复后至全行业公私合营前中西医药业情况统计表

营种类	商名称	理人	业年月	从业人	地 址	备 注
中医	怡庆堂	王汝斋	1931年5月	10	桓仁镇	1956年停业
"	春和长	于志清	1924年6月	3	"	1954年年停业
"	荣茂药铺	徐荣茂	1939年4月	2	"	1952年停业
"	东自厚生	王海楼	1945年11月	2	"	1950年停业
"	西自厚生	吴国权	"	2	"	1950年5月参加工作
"	德生厚	王桂东	1945年11月	2	"	1956年6月参加工作
"	厚生福	连文生	"	2	"	1952年参加工作
"	维新药房	李源训	"	1	"	"
"	刘膏药铺	刘凤林	"	1	"	1956年停业
"	接骨专业	杨 君	1931年3月	2	"	1948年停业
"	针灸专业	袁钟华	"	2	"	1956年6月参加工作
"	"	吴志锋	1945年11月	1	"	"
"	顺记药房	王成功	1936年5月	2	沙尖子	"
"	新华药房	张位珍	1949年4月	2	"	1952年4月参加工作
"	德义信	赵子余	1945年10月	1	"	"

光复后至公私合营前中西医药业统计表

营业种类	商号名称	经理人	开业年月	从业人员	地 址	备 注
中医 药业	益春堂	杨占东	1936年1月	2	沙尖子	1950年参加工作
"	杏林春	翟明楼	1945年10月	1	拐磨子	1956年参加工作
"	长盛德	张井贤	1939年2月	2	"	"
"	中药铺	邵延令	1945年10月	2	业主沟	1951年参加工作
"	"	于忠波	"	1	拐磨子 小荒沟	"
"	福盛长	扈逢春	1936年3月	2	八里甸	1956年停业
"	天顺源	刘清源	1935年5月	2	八里甸	1956年停业
"	德顺兴	贾守兴	"	1	岱龙江	"
"	中和祥	李中堂	"	2	普乐堡	1951年参加工作
"	兴顺成	张德俊	"	2	"	1956年参加工作
"	同义公	高殿贵	1923年3月	4	二户来	1952年参加工作
"	仁和盛	韩九功	"	2	"	"
"	中药铺	赵洪儒	"	1	"	"
"	永盛和	孟雅亭	1936年4月	2	华尖子	1952年其子孟祥儒参加工作
"	义增盛	于书焕	"	2	"	1952年参加工作

光复后至公私合营前中西医药业统计表

营种类	商名称	理人	业年月	从业人员	地 址	备 注
中医学	同太仁	范登五	1936年4月	1	横道川	1956年停业
"	中药铺	杨 昌	"	2	"	"
"	广济药房	安尚云	1944年5月	1	"	1956年参加工作
"	复兴药房	冯正修	1937年5月	2	北甸子	1951年参加工作
"	东升堂	张庆多	1933年3月	1	拐磨子 西古城子	1952年参加工作
"	永顺福	杜守禄	1929年10月	1	普乐堡	1956年参加工作
镶牙业	麟阁牙院	吴宝勋	1934年10月	2	恒仁镇	1956年2月参加 联合牙社
"	鸣九牙院	秦朋起	1933年8月	3	"	"
"	洪福牙院	任洪福	1945年11月	1	"	"
"	凤华牙院	吴庭勋	"	2	"	"
"	义生牙院	李俊志	"	1	"	"
"	靖德牙院	乔国顺	1950年10月	2	二户来	"
"	逸尘牙院	柏仲珊	1938年10月	1	普乐堡	"
"	德海牙院	郜德海	"	2	拐磨子	"
"	德礼牙院	刘德礼	"	1	沙尖子	1956年参加手工 业联 社

光复后至公私合营前中西医药业统计表

营业种类	商号名称	经理人	开业年月	从业人员	地 址	备 注
镶牙业	秀东院	王继洲	1938年10月	1	桓仁镇	1951年停业
"	振兴牙院	张顶臣	"	1	"	"
"	美术牙院	张聚伍	"	1	"	"

三、日伪时期的公立西医诊所

日伪时期，全县共划为 17 个村。康德 5 年（1938），伪县公署在镇内和全县 4 个大村（沙尖子、二户来、拐磨子、八里甸子），建立了五个公医（西医）诊所。

镇内医院叫县立医院，公医黄瑞璞。沙尖子为桓仁县第一无料诊所，公医白旭东（后由李仙洲接替）；二户来为第二无料诊所，公医焦景翔、李长珍（后由丁克任接替）；拐磨子为第三无料诊所，公医梁国相；八里甸子为第四无料诊所，公医徐胜勇、肖勤（肖克风）。

这些诊所当时称之为慈善事业，名为广大贫苦百姓治病，实际上是为有钱有势的人效劳。由于太平洋战争，无力办医疗事业，到1942年秋，全县四个公医诊疗所均自动解散了。公医们多数返籍或去外地开业，此后，由当地人自设医社、诊所谋生。如沙尖子李仙洲自设仙洲医社，二户来丁克任自设爱生医社等。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医院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于1934年2月来到桓仁县阜康村（仙人洞）。以后，在桓仁境内，以老秃顶子大山为中心的广大农村中，抗联的抗日游击活动不断发展，经常对日伪作战，伤员也不断增多，于1935年3月，开始建立抗联临时医院。这些医院有：老秃顶子山下的小冰沟子、杨木顶子和葫芦头子沟里等3处。由部队医务人员和地方医务人员为抗联伤病员诊治。一军的军医处长徐哲也常来这些医疗点巡诊。碱厂东沟的驴砬子有一个临时医院，既能住伤员，又可以保存粮食和弹药。洋湖沟、大网沟有山洞，供部队住宿及伤病员疗养，能住

60至70人。杨木沟有一个临时医院。红土甸子红通沟里的小山坡上有一处密营，再往里走不远，也有一个临时医院，是个地窖子。

此外，在华尖子的海青伙洛沟里密营，一处临时医院，当地住户张殿官的大儿子曾为抗联伤病员治病。1935年3月刚建医院时，是在海青伙洛西岔沟里的山顶上，另一个病房，是在离西岔不远的正岔沟里。由于形势不断恶化，医院搬到密营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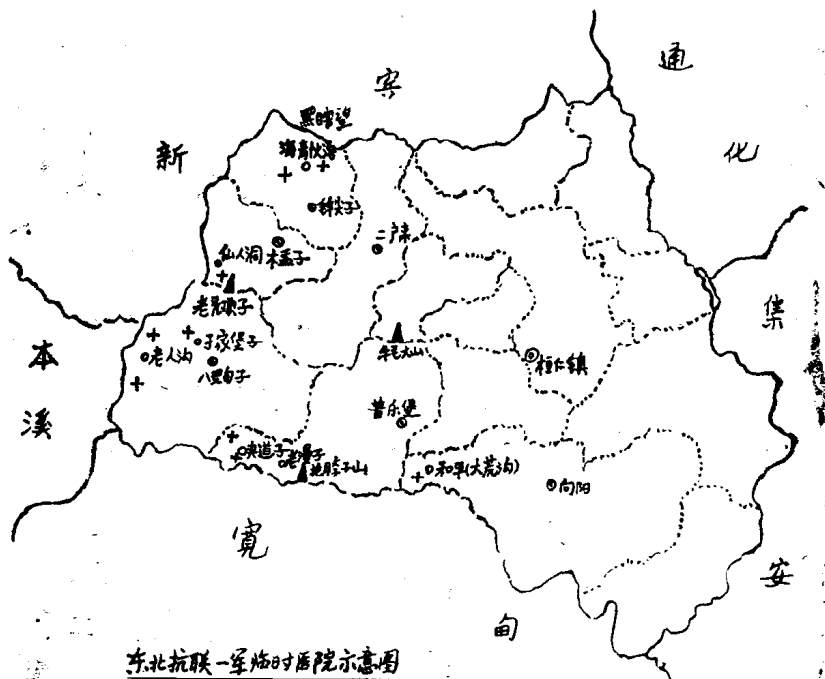
普乐堡的前后夹道子山里，分别为抗联的密营，在西北天沟里有一个临时医院，山后是一军部和教导团住过的营地。在普乐堡大荒沟（今向阳乡和平村）有抗联一军医院，1938年正月，医院住着14名、伤员，在正月十二这天，敌人包围了医院，伤病员有的牺牲、有的被捕，医院被破坏了。

在李向山领导下的地方工作中，也建立了一些秘密医院。在海青伙洛各沟岔挖了不少地窖子，能收住伤员30余人。当时药品很少，伤病员以养为主，养好了再回到部队。为了保密，医院地点经常变动。

1937年1月，抗联一师副官李向山在海青伙洛黑

瞎望（现属新宾县）密营医院养病，被特务探知，带领日军和警察把李向山逮捕，然后将密营医院焚烧。

附：抗联一军在桓仁临时医院示意图：



“万户萧疏鬼唱歌”

——日伪时期疫病流行记述

初传庸 张凤浦 供稿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的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三五年八月，桓仁地区遭受了一场特大洪水，天花、霍乱、斑疹伤害、疟疾等疫病接踵而来，其发病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死亡率之高，均为有史以来所罕见。水火刀兵，疫病蔓延，如同毒蛇猛兽张开血口，人们躲无处躲，藏无处藏，承受着灭顶之灾。先死有棺材，后死无人抬，“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一九三六年，桓仁全县死于天花的儿童就有二千人，即使是死里逃生，也十有八、九留下个麻子脸。斑疹伤寒更为猖獗，死于这种病的也不下二千人。当时，老百姓不知斑疹伤寒是传染病，只知道一人得病，全家难逃，有的全家死绝。所以，老百姓管它叫“窝子病”。县城莲沼街王家窑的黄泥泡子一带，

因“窝子病”而死的人最多。有一家姓钟的，全家六口人都患了“窝子病”，四个大人都死了，只剩下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也都病得只剩一口气了。住在小河沿的鞠淑珍看着两个孩子实在可怜，便抱回家去用偏方救活。过了两天，那个小的孩子也死了，只有那个五岁的孩子挣扎了过来，幸免一死。

一九三九年，各种传染病流行蔓延达到高峰。这一年六至九月，全县死于霍乱者近二千人；七至十月，死于斑疹伤寒者达二千余人；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天花大流行，全县死亡儿童近一千人。至于疟疾、小儿破伤风、产妇产褥热等疾病的发病率也是惊人的。据当时全县十七个行政村统计，疟疾患病率高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占新生儿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死亡数占发病数的百分之三十；产妇产褥热发病人数占产妇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死亡数占发病数的百分之十八左右。

一九三五年八月到一九四〇年三月，桓仁全县南山青烟起，北山埋死人，村村山山都一样，其情其景

令人惨痛欲绝。

解放了，人民群众当了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情况，不断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经过努力，天花、霍乱、斑疹伤寒、疟疾等传染病早已绝迹。正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军歌

1 = C $\frac{2}{4}$

韩 光 孙长礼 刘在东 回忆整理



注：此歌1932年秋，首先在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军官学校（校址通化）教唱，相继在桓仁地区普遍流行。此歌对当时抗日军民的斗志起到极大鼓舞作用。

少年营之歌

1 = C $\frac{2}{4}$

张泉山 忆 唱

(坚强有力地)

白 冰 记谱整理

<u>5 5</u>	<u>5 3</u>	<u>5 5</u>	<u>6 1</u>	<u>2̣ · 1̣</u>	<u>2̣ 3̣</u>	2̣ —
工农	兵士	反日	青年	快 快	拿起	枪,
<u>1̣ 1̣</u>	<u>2̣ 2̣</u>	<u>6 6 6</u>	<u>5 5</u>	<u>3 3</u>	<u>5 · 3</u>	2 —
杀尽	中朝	民族的	叛徒	消灭	狗 豺	狼,
<u>5 · 3</u>	<u>3 · 5</u>	<u>6 6</u>	<u>6 5</u>	<u>1̣ 1̣</u>	<u>2̣ 5</u>	6 0
打 倒	日 本	帝国	主义	推翻	满洲	国,
<u>1̣ 1̣</u>	<u>2̣ 2̣</u>	<u>3̣ · 2̣</u>	<u>1̣ 1̣</u>	<u>6 6</u>	<u>2̣ 2̣</u>	5 —
建立	民族	自 己	政权	大家	有福	享。
<u>X X</u>	X	X	0			
一 二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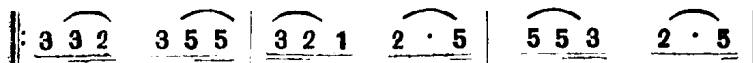
张泉山：1935年任杨靖宇警卫员，1939年7月任抗联一军少年营一连连长。现为黑龙江省军区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副师级待遇。

抗 战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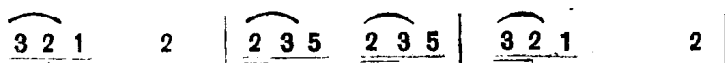
G 调 $\frac{2}{4}$ 中速

韩贵林 忆 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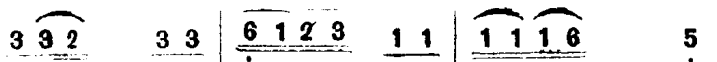
李文学 记谱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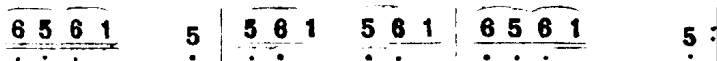
月 儿 弯 弯 影 儿 长 啊 呀 儿 哟
问 你 家 住 在 哪 里 呀 长 城 外
问 你 为 什 么 不 回 去 呀 提 起 来
他 们 都 烧 什 么 地 方 呀 什 么 地 方



哟 儿 哟 呀 儿 哟 呀 儿 哟 哟 儿 哟
大 道 旁 村 口 正 对 松 花 江
活 儿 长 日 本 鬼 子 动 刀 枪
都 烧 光 烧 完 这 村 烧 那 庄



流 亡 的 人 儿 思 家 乡 啊 呀 儿 哟
莫 非 就 是 王 家 庄 啊 王 家 庄
日 本 鬼 子 怎 么 样 啊 怎 么 样
他 们 都 杀 什 么 样 的 人 哪 什 么 样 的 人



哟 儿 哟 呀 儿 哟 呀 儿 哟 哟 儿 哟
是 家 乡 今 年 不 知 怎 么 样
赛 虎 狼 见 人 就 杀 又 枪 粮
也 难 防 十 人 九 个 把 命 丧

抗 联 歌 谣

张成礼、李文学 搜集整理

杨司令爱人民

天上星，亮如银。

杨司令，爱人民。

转战深山打日本，

他给人民解了恨。

杨 家 将

杨家将，杨家兵，

杨家兵将骨头硬。

别夸当年杨六郎，

且看今朝杨司令。

杨家兵，杨家将，

个个抗日好榜样。

上阵杀敌赛猛虎，

鬼子一见就投降。

只因抗联叔叔来

说奇怪，真奇怪，
哑巴也能把口开，
瞎子睁眼看千里，
瘸子走路飞样快。

说奇怪，不奇怪，
只因抗联叔叔来，
穷人一步上了天，
寒冬腊月百花开。

全家表心怀

燕子一飞来，
鲜花一齐开。
抗联叔叔到，
全家表心怀。
爹做五味酒，
妈炒豆芽菜，
姐姐送军鞋，

我献武装带，
颗颗子弹长眼睛，
鬼子脑袋当瓢开。

小 鞋 匠

小鞋匠，日夜忙，
扎鞋底，纳鞋帮，
做出鞋子一双双，
进山里，送老杨（注）
穿在脚上打豺狼。

注：老杨，是指杨靖宇将军。

扔 坑 打 弹

扔坑打弹，骑马射箭。
扛枪比武，单打老虎。
老虎上山，单打汉奸。
汉奸掉牙，单打警察。
警察断腿，单打日本鬼。
鬼子垮台，我们扭起来。

没等进村死一排

抗联到，

人人笑。

爷爷奶奶送粮草，

孩子点起小花炮。

鬼子来，

遭了灾，

百姓早把土雷埋，

没等进村死一排。

日本鬼赔本

日本鬼，喝凉水儿，

打了罐子赔了本儿，

坐火车，轧断腿儿，

坐轮船，沉了底儿，

进山里，挨枪子儿，

两眼一闭蹬了腿儿。

富 尔 江 史 话

王 从 安 供 稿

富尔江，也称富江。清末民初又名吴儿江、芙蓉江。吴儿、芙蓉都是富尔的谐音。

富尔江源出辽宁省新宾县东北部金厂岭。沿新宾东部，自北而南流入桓仁县境；又沿桓仁东北部，由北而南，于桓仁、通化两县交界处注入浑江。全长103公里。桓仁县境内流长40公里；桓通两县过境流长8.5公里，这段界江，如今已成了浑江水库的库区上端。

富尔江在桓仁县境流经业主沟、拐磨子、北甸子三个乡镇，灌溉着三个乡镇的一万三千多亩水田；哺育着三个乡镇的三万五千多人口。利用富尔江水，拐磨子和业主沟分别在1980和1982年建成了卫东、红旗一坝和红旗二坝，其中有两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年均发电量分别是118.5和45万度。三个乡镇中的拐磨子镇，有水田8686亩，在全县8个乡镇中，水田数量、水稻产量均占第二位。1985年全镇有栽植人参(园参)48.926帘，产鲜参39.62吨，在

素有辽宁人参故乡称号的桓仁的各乡镇中名列榜首。

富尔，也是沸流的谐音。富尔江即古沸流水。沸流水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

“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破其国”的国，即位于今集安县城的高句丽都城“国内城”。《三国志·魏志·毋丘俭传》中也有：“正始中，俭以高句丽数侵叛，督诸年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丽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悬车以登丸都，屠句丽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

汉、魏、晋时期的江河多称“水”。辽河称大辽水，浑河称小辽水，太子河称大梁水，苏子河称南苏水，鸭绿江称马訾水，浑江称盐难水。有人认为浑江也是沸流水。浑江当然不可能在这一时期既称盐难水，又称沸流水。富尔江那时是沸流水，不容置疑。

富尔江在桓仁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富尔江两岸是桓仁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56年富尔江两岸的考古调查发掘，采集了大量石器、陶

器。均属新石器时代遗物。富尔江两岸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在明代，富尔江两岸又是建州女真进入辽宁后最早的居住地①。朝鲜《李朝实录》中称之为吾弥大水的就是今天的富尔江。其所称吾（兀）弥府，就是今桓仁县拐磨子镇富尔江北岸的东古城子村②。兀弥府曾是建州女真早期著名首领、明朝勅封为建州卫都督的李满住的居住和被李朝朝鲜军队杀死的地方③。富尔江两岸，直到明末，一直是建州女真重要的居住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朝鲜使者申忠一，出满浦，沿富尔江去建州进见努尔哈赤时，富尔江两岸已是部落相连，人口很密的地方了④。

富尔江河谷，又是唐代以前的古战略要道。汉建安十四年（209）公孙康出辽东，破高句丽“国内城”，进军就是这一路线。魏正始年间，毋丘俭出玄菟、破高句丽丸都城，也是这条路线。晋咸康八年（342）燕王慕容皝进击高句丽，“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他决定重兵从“南

①、②、③、④均见辽宁民族研究所：《满族研究》1986年第3期《满族先世在桓仁》

道”进攻，同高句丽王钊，大战于木底。木底就是现在新宾县的木奇镇①。所谓南道，也是这一条道。即逆苏子河东进，再顺富尔江南下，过浑江，溯新开河，通向今集安所在的高句丽王都的最近的战略要道。母丘俭进击高句丽，句丽王宫，为迎战魏军，亲率二万人马进军沸流水上，与魏军大战于梁口之役，当是现已被浑江水库淹没的原北甸子村。

朝鲜史书《东国通鉴》对此记载更较具体：“魏正始七年（246），高句丽东川王二十年秋八月，魏遣幽州刺史母丘俭，将万人出玄菟，侵高句丽。王将兵骑二万，逆战于沸水上，败之，斩首三千余级。又引兵战于梁貊谷，败之，斩首三千余级。王谓诸将曰，魏之大兵，反不如我之小兵；母丘俭魏之名将，今日命在我掌握。乃领铁骑五千进击之，俭为方阵死战，丽军大溃，死者万八千余人”②。高句王逆战于沸流水上的“逆”，按地理位置分析，只能是逆今富

①中央民族出版社：《〈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
东北卷69页。

②金毓黻《东北通史·上册》121页

尔江之水，不可能逆今浑江之水。高句丽王如果是出今天的集安，而逆浑江去返战，则毋丘俭将不是从玄菟出兵，而是从长白山出兵了。

《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中的“大战梁口”，即今富尔江口①，但不是通化县一侧的富尔江口，而是桓仁一侧即富尔江右岸的江口。它地势宽阔、平坦，南流的富尔江至此，为西南流的浑江所拦截，汇入浑江。富尔江右岸江口，浑江水库1969年蓄水前，是桓仁县北甸子村集中的居民点。此地，在群山环抱中开阔、平坦，是古蛤蜊城所在地②。民国19年版《桓仁县志·地理志》：“蛤蜊城，在城东北六十里。富尔江水，由此会入浑江。四周皆山，山脉伏西向西南为土岗，环结迴亘约有数里，城建于此。不知何代所筑，迄今基址犹存。城内外地势宽平，土质深厚。居民耕种其间，常得枪头、箭簇等物，其形式均非近时兵器”此城现已水没。梁口之战，对高句

①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28页

②见民国19年版《桓仁县志》第一册附《桓仁县区村全图》

丽而言，是他战败后的背水（浑江）之战。此处 在群山环抱中开阔平坦，地势较低，窝风。据当地老年群众说清朝时期，每当雨季夜间，常闻隐隐嚎叫声，当地居民一向称此地为“阴城”。当是大战于梁口的古战场，以其战死者过多，而得此名吧。

唐乾封二年（667）唐朝军队征讨高句丽，唐将庞同善从新城（今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进拔木底、苍岩，与已经内附唐朝、而固守在国内城（今集安）待援的泉男生相会。可见木底、苍岩的位置均在新城通往国内城的通道上。即逆苏子河然后顺富尔江再溯新开河抵今集安的通道。木底在苏子河畔，苍岩则是新开河口隔浑江与富尔江斜对的霸王朝山城。城扼新开河口咽喉。在这条通道上，高句丽层层设障，山城联线。继霸王朝山城向北上，有浑江西岸富尔江口右岸的蛤蜊城。再溯富尔江北去，在新宾县双砬子村、富尔江西岸2.5公里处，有四道沟“高力城”。再北，响水河子乡所在地附近距四道沟高力城9公里处有转水湖山城。由此向西，在苏子河中游有木底城。慕容皝征高句丽时，其先锋官慕容翰，同高句丽王

钊，曾大战于此城。唐太宗之际，李勣征高句丽也曾攻克此城。再向西，还有苏子河口的南苏城。一路连城，标明这一通道在古代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嵌石岭上现称之为转水湖山城的响水河子附近的高句丽山城。位于富尔江中游左（东）岸，距富尔江0.5公里，南距响水河子乡政府所在地2.5公里。响水河子，村名，富尔江水从村西向南流。此地原属桓仁，1946年划归新宾县。旧《桓仁县志》载：

“嵌石岭在县城北百里，东倚岗山岭，西临富尔江，陡壁悬崖，无路可登。由山下东面转水湖北有小道焉。仅容一骑。山有旧城，俗呼曰高力城”。山城海拔609米，城下山脚江岸附近海拔393.2米，沿江岸下行6公里，至响水河子村下头，江岸附近海拔即降为379.4米。6公里内高度降低了13.8米。这段江道，河谷隆起，“哨”长约半公里，落差大，流水哗哗作响，夜深人静，响声可达数里之外，因此名为响水河子。《辽史·地理志》中关于正州的位置：

“正州，本沸流王故地……，有沸流水，户五百，隶涿州，在西北三百八十里”。所称沸流水，是以水流

“湍急，水响如沸”而得名。沸流水正是指现在响水河子名称由来的富尔江而言。沸流水即富尔江。响水河子附近的地理位置，正与《辽史·地理志》所记正州相同。古涿州即今吉林省浑江市临江镇，响水河子一带，正合乎在其“西北三百八十里”的记载。辽代，涿州鸭绿军节度下分四个州，除涿州在今临江镇外，桓州在今集安，丰州在今托松县，正州就在以响水河子为中心的富尔江流域。辽代的涿州，是沿袭渤海的西京鸭绿府而来，渤海的鸭绿府有神州、桓州、丰州、正州四个州。辽代改神州为涿州，其余未变。

响水河子转水湖山城就是沸流王故地。《三国史记》载：高句丽东明五二年六月，沸流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可见沸流王故地即多勿都。“哥勿”是“多勿”的谐音，《新唐书·泉男生传》：男生走保国内城，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兵内附，举哥勿、南苏、苍岩等城以降”。哥勿城就是此城。唐总章元年(668)灭亡了高句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下设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九都督府中的哥勿州都督府，就在哥勿城。此域

距桓仁县城50公里，今桓仁在唐初隶于哥勿州都督府。在渤海以及辽代，隶于正州，而不是桓州。古桓州离桓仁直距100多公里，不可能舍近而属远。以古代桓仁之地隶桓州，而改县名“怀仁”为“桓仁”，是历史上的一次失误。

桓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苏长清 郭俊武 供稿

桓仁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较多，分布于浑江中游、富尔江沿岸的长岗、腰段、大臭里崴子、连江、莺歌通、横道川、孔家街、东西长春沟、弯龙背、大牛沟、北甸子、老黑背、小荒沟、上古城子台西沟、下古城子、狍圈沟、南边石哈达、米仓沟等40多处村（屯）附近的台地、滩地、山坡上。考证出土的遗物表明，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于商、周、春秋诸代青铜器时期。

这些遗址，由于常年水土流失和被垦为耕地，已多半成为一片较平坦的地面。1956年~1983年，共采集出土遗物1000多件。分石器、陶器两大类。石器有石斧、石刀、石碾、石矛、石锤、石铲、石网坠、石环等。其中石斧较多，石网坠次之。陶器为手制，多是素面，灰色粗陶，并含有滑石粉粒和云母片。

小荒沟遗址是在1980年秋发现的。位于拐磨子镇小荒沟村西300米处的小西沟北侧一个面南背

北的山场顶部。北距富尔江500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地面为腐植土。高句丽时代的残陶片俯首可拾。历年来在该遗址地表采集到多件琢制磨刃石斧、桥形板耳、圆柱形器耳、陶杯、网坠等遗物，其陶器均为夹砂粗陶，色呈红褐、灰色，与下古城子出土的陶器相似。1982年，本溪市文物普查队，又在该遗址挖一小深坑，面积0.5平方米。发现遗址堆积厚度约1.5米，内含红烧土、灰炭等。并在附近地表采集到贝壳、骨针、陶纺轮等遗物。从而说明该遗址在新石器时期已由母系社会进入男耕女织的时代。

上古城子台西沟遗址，是在1980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位于六道河子乡上古城子村东南方向100米处的一块相对高度7米的台田上，面积3500平方米。表层为黄土风化石，遗物较丰富。有琢制磨刃石斧、打制亚腰形石铲、磨制石刀、石矛、石镞、夹砂残陶片、陶纺轮等。其陶器耳、底、口沿均于小荒沟遗址采集的器物相似。

在八里甸子镇八里甸子村狍圈沟遗址采集的石器有琢制磨刃石斧、双孔石刀、石凿、石铤、石镞、石

锤、石环、石纺轮、石砺、切割器等。陶器有圆柱形器耳、桥形板耳、豆足、口沿、器底、纺轮等，内含滑石粉粒。

上述遗物与上古城子村台西沟遗址的遗物，在打制、磨制、手制的形式与技术约相同。

仅从小荒沟、台西沟、袍圈沟等遗址采集的遗物考证，其文化内涵是紧密联系的。虽然在时间上有早晚之分，但有可能同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由此可见，桓仁地区，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繁衍、生息，创造出璀灿的少数民族科学文化。

毛克铜印

邵文津 供稿

一九七五年四月下旬，在桓仁县八里甸子马鹿泡出土一颗“毛克”铜印（见照片资料16）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这颗铜印是马鹿泡村民孟宪伟于村东二百米处种苞米时，用犁杖趟出来的。印通高4.5厘米，印面 7.3×7.4 厘米，印面厚1.5厘米，青铜铸造，较粗糙，印文为《扎迪吉弼罕毛克印》八个字，采用的九叠篆体。印面中间微呈凹形。一九七六年春八里甸医院周俊生去沈阳办事，携带该印捐赠给辽宁省博物馆。

“毛克”（即“谋克”）《辞海》中注释为女真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中的氏族单位，猛安为部落单位，一猛安包括八至十个谋克。在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完颜旻）建立金政权的前一年（公元1114年）又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金熙宗以后（公元1135年），又成为军事编

制、生产单位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组织。

在金代，桓仁这个地区属东京路下的婆速路。婆速路是相当于府、州级的地方行政区划。其下不领民户，不分州县，只领猛安、谋克。猛安相当于一个防御州，谋克相当于一个县①。

这颗铜印的出土，无可辩驳的证明，现在桓仁县八里甸子一带，当时就是女真人繁衍生息的地方。

“扎迪吉弼罕”就是这个部落的名称。

注①：详见《中国历史地图集·金、南宋时期图组编例》

